

目 錄

- 論歌德派(代序) 馬鉄丁 (1)
- “今天天气……” 徐 匯 (4)
- 社会主义这一关 甘 草 (7)
- 过五关斬六將 梁汝怀 (8)
- 野心 謝覺哉 (11)
- 杂谈帽子 吳 松 (13)
- 右派隱形术 阮延順 (16)
- 右派謬論的后面 崔 蒙 (18)
- 一种右派人物的灵魂 姚文元 (21)
- 閑話“政客” 司馬兵 (23)
- 下台和上台 張 明 (25)
- 拉誰下馬 鍾 况 (26)
- 有这样“坐轎”的人 何 健 (27)
- 算賬 任 晦 (29)
- 也說算賬 常 海 (31)
- “真偽有誰知” 东郭迪吉 (33)
- 奉劝魏猛克先生 何 平 (34)
- 脫褲子 飄 然 (35)

- 臆言和事实.....艾明之 (38)
- 弦外之音.....以 群 (40)
- 从“宋江”和“吳用”談起.....子 西 (42)
- 假設.....夏禹龙 (44)
- “领导”和“人”.....常 海 (46)
- 也談古人.....余持平 (47)
- 論“哇啦哇啦”.....岳 軍 (49)
- 立場問題是客觀存在的.....唯 真 (53)
- 立場的考驗.....黑 崖 (54)
- “美国的慷慨”.....董 代 (56)
- 也需要揭盖子.....唐 弢 (58)
- 关于“卫道者”.....盧 文 (61)
- 談“但丁派”.....王 城 (63)
- 清君側.....江 流 (65)
- 談积极分子.....何 平 (67)
- 續談积极分子.....何 平 (68)
- 积极分子万岁.....天 馬 (70)
- 陈孝禪搞什么鬼.....何 平 (72)
- “唯唯諾諾”和“独立思考”.....原 东 (75)
- 到底誰是“木腦瓜”？.....孙殷旺 (77)
- “墮性”和“独立思考”.....克 之 (80)
- 偷換概念，顛倒邏輯.....朱 白 (81)

- 士的性格 凡 兵 (83)
- “士为知己者死” 克 約 (85)
- 談“礼賢下士” 潤 海 (87)
- “旧知識分子” 駱 漠 (88)
- 小論右派之“才” 原 冰 (90)
- 斥“惜才論” 張 起 (93)
- 談“鋼筋” 粟福炳 (94)
- “脫胎換骨” 克 約 (96)
- 談“有职无权” 覺 哉 (98)
- “有职无权” 种种 公 揚 (100)
- “緘口”之論 余持平 (103)
- “庶人不議”与“庶人議” 陈旭麓 (105)
- 論“雅量”哲学 熙 文 (107)
- 談“一棍子打死” 飄 然 (109)

論歌德派(代序) 馬鉄丁

一 我們是歌德派

“你是歌功頌德的，你是歌德派”

一点也不錯，先生，你講得对；我們正是歌德派！我們是歌人民之功，頌人民之德；歌社会主义之功，頌社会主义之德的歌德派！

“歌德派”，你認為是惡諛，我們認為是美譽，你我之間的字典本来就缺乏共同的語言，如此不同的！

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統治，难道你不高兴嗎？正在建設社会主义，难道你不高兴嗎？我們的工业发展，新中国的七年大大超过旧中国的一百年，难道你不高兴嗎？我們的粮食1949年产2千8百亿斤，1956年已經达到年产3千6百亿斤，难道你不高兴嗎？占全国人口的絕大多数的工农生活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难道你不高兴嗎？

你所不高兴的事情，我們可高兴得很！“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詩大序）。

為我們祖國的獨立，富强；為我們正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飞速前进，我們是要“言之不足故嗟叹之”的，是要“嗟叹之

“不足故永歌之”的，是要“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

莫非我們的欢乐，正是你的悲哀？我們的高兴，正是你的倒霉？我們的揚眉吐气，正是你在向隅而泣嗎？

先生，你不高兴，你难过，你夢想恢复失去的“天堂”，悉听尊便。

我們要歌，我們要頌，我們是歌社会主义之功，頌社会主义之德的歌德派！

二 那么，你是什么？

你譏諷我們是歌德派，那么，你是什么？据我看：你是和我們絕然不同的，以反歌德派为名，其实是另一种歌德派：——歌反人民之功，頌反人民之德；歌反社会主义之功，頌反社会主义之德。（这个“德”，是按照你的想法或說法說的，按我們来看呢？那叫缺德）

“現在許多人都說資本主义不好，事实上資本主义也还有活力。就因为有多党制度，有民主制度，有众議院和參議院，有在朝党和在野党。光緒皇帝为什么完蛋，就因为沒有民主。資本主义也有好的地方，也就是說有互相抑制，互相監督的作用。”

（章伯鈞語）

这是歌德派嗎？是歌德派，不过是歌資本主义之功，頌資本主义之德的歌德派罢了。

“資產階級分子已經沒有兩面性了，比工人还进步，用不着改造了”，“定息不是剝削”。（章乃器語）

这是歌德派嗎？是歌德派。不过是歌資產階級之功，頌資

产阶级之德的歌德派罢了。

自然，还有更加等而下之的，所谓“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美国的巴掌比中国的响”，那就“歌”到肉麻的程度，也“颂”到肉麻的程度。

自然，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现代，明目张胆的歌反社会主义之功，颂反社会主义之德，究竟是不大可能的。因此，有时他们表面上也歌社会主义之功，颂社会主义之德，不过前者是真的，后者是假的。用假的掩护真的。等到喝了一点子雄黄酒，立刻原形毕露！

三 一个标准

两种歌德派——一个是歌社会主义之功，颂社会主义之德的歌德派。一个是歌反社会主义之功，颂反社会主义之德的歌德派——究竟谁服从谁呢？是非曲直，以什么作为判断的标准呢？

标准是有一个的，那就是：宪法，走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领导，都是在宪法规定清清楚楚的。

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歌者、颂者，他们的一切违反宪法的言论和行动，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还是早些收起为妙。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歌者、颂者。

至于歌社会主义之功，颂社会主义之德，那是人民的自由，人民的权利。全国人民中的任何人都是这个伟大歌德派的一个成员！

（原载“文艺报”）

“今天天气……” 徐 汇

不知道从哪一天起，有些报纸的编辑部对“今天天气……”的兴趣高涨起来了。有一阵，有的报纸几乎变成了“气象报”，不过，他们摆脱了“气象预报”的公式，换上了文雅的词句：“解冻”、“春寒”、“乍暖还寒时候”、“乍暖还寒晴复雨”、“春迟”、“春风不渡……”等等。一片阴冷，最高气温总在零度左右。

这是怎么回事？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的北半部，生活在同一个国家的同一个城市里，人们对气候的感觉怎么会这么不同呢？

原来这里说的，既不是“今天天气，哈哈哈……”之类的官话，也不是自然现象，而是政治气候。它表明：在社会大变动中，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对于政治气候各有不同的感受，这些人说“寒”，那些人说“暖”。

我们常常说到1949年。就是在这一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彻底地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我们站起来了”，饥寒交迫的奴隶上升为国家的主人。我们总不会忘记那一年的5月26日吧？人民解放军进了上海，自由也就来到了上海。不论是外滩的银行，还是杨树浦的工厂；不论是土地，还是河流；不论是太平洋上吹来的暖风，还是昆仑山上飘来的白云；不论是东方的朝霞，还是皎洁的月光，这里的一切，我们祖国的一切，从此都归人民所有了。成千成万的先行者播下的幸福的种子结果了，1921年在这个光荣城市举起的红旗胜利了。这不叫“解冻”？这不叫春天？1949年的春天，这是我们人民的第

一个春天，我們这样感受，也有权这样说。

可是，偏偏有人不同意。甚至在过了八年之后，还在那里說：“春寒”、望“解冻”，好象春天根本没有来过。这中間的道理，想来也不太难懂，各个人的地位不同，“主人”下台，奴隶上台，怎么能够有共同的感受呢？要那些昔日的“主人”歌頌奴隶們的春天，那自然是幻想。

还有一些人，他們过去也没有在台上，而是依附在旧的根基上生活的。到了1956年春天，这个根基被挖掉了。这对劳动人民來說，是社会主义的春天，对有些人來說，是冬天。对另一些人來說，却是“乍暖还寒”：“暖”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毕竟给了他一些好处，新社会看来并不可怕，甚至还有一些可爱，为新社会服务是值得的；“寒”的是这毕竟是个新社会，要它为它服务就需要改造自己，自己还没有适应这种变化，总觉得新社会这也不习惯，那也不习惯，不如旧社会“温暖”。在这一寒一暖之間，今天向左边靠靠，明天又向右边靠靠，拿不定个主意，站不稳个立場。也就是徐仲年教授所贊揚的那么一种“动摇性”，在这一部分人中間，还是比较經常出現的。

刚刚过去的几个月，对于我們每一个人都是难忘的。我們参加了多少次會議和交談呵，多么热烈的會議，多么亲切的交談呵，党和人民的心靠得多么近呵！有一些对新社会有感情又不习惯的人，也受了感动，向党說了知心話，同党、同劳动人民更接近了。但是，也用不到隱瞞，在資产階級右派分子煽动起来的歪风邪气里，也有人迷失了方向。对政治气候的感受本来就有不同，暫时的、偶然的迷失了方向，对有些人來說，这本来也是难免的，有的人不知道要經過多少次的探索才找到正确的方向。所

以,出現这种情况,也不必奇怪。

由右派分子的挑战所激怒的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起了对右派的反击,那些曾經迷失了方向的人,有的人明白过来了,同右派分子划清了界限,但也还有一些人看不清局势,看不清现在除了共产党的整风运动,还有一个右派分子的反共运动,这是一种阶级斗争。他们又表示不安了,他们鼓起眼睛,望着天空:“今天天气……”

今天天气很好:右派分子祭起的乌云和妖风正在溃散。他们抵不住马克思主义这一降妖的法宝。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发表了,他象太阳一样,驱散了云雾,照亮了人民的眼睛,使人民有了武器,去战胜牛鬼蛇神。

一个人迷失方向,虽然不是好事,却可以变坏事为好事。只要他走到正确的方向来。有的时候,曾經迷失过方向又走到正路上来的人,反而成为后来的人们的引路人。而目前反右派的斗争正在紧张地展开着,这正是帮助那些迷失过方向的人寻找正确道路的时候,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坚定自己的政治方向的时候。这真是千金难买的大好时光,右派的英雄好汉们作我们的先生,教给我们许许多多平时不易学到的东西,使我们懂得什么叫左派,什么叫右派,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什么是真的、美的、善的,什么是假的、丑的、恶的,使我们每一个人再一次看一看我们自己站的立场是否正确,懂得怎样才能把自己锻炼成一个真正的、不带括号的左派。

夏天是长庄稼的季节,也是毒草想着压倒庄稼的季节。是同劳动人民在一起,在党的领导下,向毒草作斗争,并且在斗争

中改造自己成为一个左派呢？还是站在相反的地位；帮助毒草盖过庄稼？还是走“袖手旁观”的所谓中间路线呢？这是我們应当想一想的問題。

我們常常說，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只是望着天空，感叹“今天天气”变化太快，能給自己帶來什么好处呢？如果真的想着从迷途中走出来，那就要迈开第一步。

（原載“解放日报”）

社会主义这一关 甘 寧

近几天，右派分子的日子不大好过了，想逃避是逃不了的，在群众压力之下，他們被迫承認了一些反社会主义的丑惡勾当。上台发言，汗珠一陣一陣地淌，声調帶哽；下得台来，香烟一根接一根地抽，苦思应付之策。对于这些慣于飞揚跋扈、叱咤风云的头面人物說来，这个場面大概是初次領略。当然，这不容易，这是过关，过社会主义的“关”。

几年以前，毛主席就說过要过“三关”的問題。

“三关”，即战争关、土改关和社会主义关。

这“三关”，是我国十年来政治形势的最簡明的总结和預見。前兩关是民主革命，后一关是社会主义革命。三关俱过，才算得是一个真正的革命派，所以这“三关”是对全国一切人們和民主党派の考驗。

工人农民經過了这个严酷的考驗，够得上一百分。大多数知識分子呢？前兩個关是比較好过的，反帝、反蔣、抗美援朝，好得很，举双手贊成；土改，也瓜葛不多，拥护。但社会主义这一

关，就不那么簡單了，从維持了几千年的經濟制度到人們的思想意識要来一个彻底的改变，虽未必如章乃器說的“剝皮抽筋”那么可怕，也确实要脫胎換骨。只有一副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好心腸是不够的，要下决心把自己来一个否定，在思想上、感情上、习惯上乃至立場上都作一次認真的改造，許多东西需要重新調整，重新习惯。跌跌撞撞，这一关多数人也許也能过得好。

問題是在一些資产階級右派人物，看起来这社会主义一关硬是过不去，虽然路是阳关道，关門又大开，却无認真过关的愿望。去年的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如怒海奔騰，泥沙俱下，魚龙混杂，把抗拒社会主义的分子也夾在这浪潮之中混过关来，冒充是社会主义的新人。曾几何时，这些混世魔王就原形毕露了！

話又說回来，这些人物之所以过不了社会主义一关者，实在因为他们們压根儿就沒有过好战争关和土改关之故也。解放战争正甜之际，章伯鈞却醉心于“南北朝”的迷夢，企图占山为王、做总司令，与中共爭天下。土改这一关呢？为地主伸冤者有之，罵农民过火者有之。試想想，不过好民主革命之关，岂能过好社会主义之关？拖着一身骯髒，怎能冒充新郎？

所以奉劝这些大人物，还是浪子回头、洗心革面，老老实实地来过社会主义这一关吧！

（原載“人民日报”）

过五关斬六將 梁汝怀

在一个會議上，听到一位领导同志把知識分子在反右派斗争中的思想改造、确立社会主义立場，喻之謂过五关斬六將。語

短心長，給我們很多启发。

在近三、四十年的历史中，中国知識分子确实经历了过好几关：经过了了好几次革命战争的关；也经过了土地改革运动的关。那些关的把关大將，都是些十分厉害的敌人：有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有官僚资产阶级。这些敌人，既横在关前，也藏在人們的思想意識里，所以知識分子过这些关，并不全象当年关云長那样容易。

在这些关口上，他們有許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跃馬橫刀，既斬了守將，也扫清自己思想意識里的障碍，尽管经历險阻，总算闖过来，改造了自己。有的先是趑趄不前，誠惶誠恐，到得关口，或則夾雜在千軍万馬中輕易地混过了关，或則又退了回去，始終未能过来。有的在敌人面前或在自己的頑强的思想意識前招架不过，就下馬請降，在过去那些把关大將帳下当一名俘虏。也有的根本就是安于躲在那些关主帳下，不肯过关的。人民力量摧毁了那些关主，但是这些人都仍然心在“故国”。

回首前尘，每个人都会有一段辛酸的或者是甜甜的記憶。这是甘苦自知，別是一般滋味在心头的。

而今，来到第五关的关口上了。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关。

这一关比起前四关，說好过也好过，說难过也难过。

說好过者，有了前几次过关的经历，手里也就增加了战胜敌人、認識自己的武器，渾身也就勇气陡增；何况在身后的，是更加壯大的党和工人阶级，給你最好的条件，最大的支持。然而，难过者，把这一关的第六將更加刁钻，原来他非別人，正是一切非社会主义或者反社会主义的旧思想、旧意識。

有人也許哈哈大笑說：我道是誰？原来就是它！在思想改造

运动中，我已斬了此將也。

我說：且慢！將軍之言差矣。当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对許多知識分子說，只是初步解决了为人民服务的立場問題，辨清了与三大敌人思想界限的大是大非。辨別那个大是大非是十分需要的，从这次反右派斗争中看，不是也有許多人至今連这个大是大非也沒鬧清楚嗎？但是，万里長征，过了一关还有一关。如今到得社会主义关前，客观上是时代和社会对知識分子的要求更严格，主观上是个人思想意識上的旧包袱至此也可以丟得更多。这就需要解决根本的思想立場問題，明辨另一个大是非。这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資本主义道路？拥护共产党领导，还是不要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的民主集中制，还是迷恋資本主义的虛伪的“民主自由”？主張团结全国人民，还是主張分裂人民？要巩固人民民主專政，还是要搞資产階級專政？要社会主义的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还是要同帝国主义勾藤搭絳？弄清了这个大是非，比起前几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就能更迈进一大步。改变了根本立場，从此步步都能走上阳关大道了。

当年关云長过第五关黄河渡口，守將秦琪也算得一員大將，然而“二馬相交，只一合，关公刀起，秦琪头落”。就此渡了黄河。而現在橫在知識分子面前的这一將呢？因为它正象变成雌螻虫儿钻进罗刹女肚子里的孙行者，是藏在每个人头腦内部、灵魂深处的，就不那么好斬。因为中国的知識分子，几十年来生聚教訓，都是在資产階級的空气里，对資产階級的思想、意識、感情，是如此多情，一拍即合；对社会主义思想、意識、感情，却总是有些陌生，格格不入。对許多知識分子說，在口头上拥护社会主义容易，在思想立場上符合社会主义就难；在道理上懂得社会主义容易，

在意識、感情上改造成社会主义的，就非一朝一夕之功。为什么有些共产党员会墮入右派泥潭，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他始終沒有跟党一条心，思想上始終並沒有入党。他可以跟着党通过以前几关，而在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面前，就通不过了。

因此，斬这第六將，首先得有同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意識感情拚个“你死我活”脫胎換骨的决心。这就需要絕大的勇气。勇气出之于对丑惡、腐朽的旧思想、旧意識的憎恨，洗面革心，大彻大悟。能不能坚决斬掉自己头腦內部、灵魂深处的敌人，也就是說能不能做到新的大义灭亲，这是每个知識分子（包括笔者本人在內）在这次反右派斗争里必須回答的問題。

（原載“人民日报”）

野 心

謝覺哉

做社会主义之官，吃社会主义之飯，讀社会主义之書和報，看到并亲自体验到社会主义建設之輝煌成就，時間經過了八年，而一点无动于衷，不仅无动于衷，且要陰謀反噬，不是“別具野心”的人，不可能有这等本事。

有的右派分子說·他們之所以这样，是出身剝削階級；受过英美資本主义教育；加上沒有好好学习，以致反动立場仍然存在。不錯，右派分子的反动立場是根深蒂固的。但不少有反动立場的人，已得到了改造；未完全改造过的人也多数是“頑而不固”；就是頑固的人也不都鬧事。右派分子不这样，他們不是只有坚定的反动立場，而且还要擴張其反动立場的个人野心。

野心者不可告人之心也，其实他們也已經明白地告訴人了。

历史上的野心家有兩句“箴語”：一句叫“彼可取而代之”。取而代之，並不是說我取了你的地位，比你能多做事，能多為人民服務，而是說取了你的地位，好站在人民的頭上作威作福，“你不行，我來”、“兩院制”、“民主黨派輪流執政”、“黨委退出學校”、“公方代表退出公私合營企業”及其他等等，機關事業不論大小，一句話，我要“取而代之”。他們不是已在國家“包下來”和“適當安排”的政策下都有了地位嗎，有的職位已經很高。但他們說，不過癮，雖然是官高祿厚，却不能自由地在人民的頭上“洒尿”。

另一句話是：“屈于一人之下，伸于萬人之上”。野心家知道人民是他們的對頭，因此需要有後台，不然就站不住。以前“伸于萬人之上”的皇帝，認天做老子，說自己是“天子”，概念上有勢力的“天”可以做老子，實際上，有勢力的人——外國的侵略者更可以做老子。從石敬瑭到西太后、袁世凱、蔣介石都是如此。右派分子也並沒忽視這個傳統。他們對美帝國主義者說：“你們買錯了馬”。美帝國主義者大概也從失敗中吸取了教訓，從艾奇遜到杜勒斯都已經把侵略的希望寄托在所謂中國民主的個人主義者身上。恰恰就在右派分子囂張的時候，杜勒斯發表了演說，他說：“中國人民首先是個人主義者。我們有信心把這樣一種假設作為我們政策的根據：國際共產主義的強求一致的統治，在中國和其他地方一樣，是一種要消逝的而不是一種永久的現象”。杜勒斯和右派分子的妙算一樣：中國即會大亂，共產黨站不住了。“個人主義者”即會使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消逝”。我不是說右派分子和侵略者已有甚么勾結，但是，如果誰想勾結帝國主義來反對祖國，他的結局是很清楚的。事實很明显，沒有共產黨不是不會亡國，而是馬上要亡國的。

野心这东西，叫做“生于其心，害于其事，生于其事，害于其政”。它能扼杀人的智慧，使之看不清自己，也看不清别人。“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右派先生們的悲劇，就在这里。但大的悲劇还在后面。不仅是全国人民在向他們声討，而重要的是太平洋彼岸的侵略者和台湾的卖国匪帮在向他們欢呼并遙致敬意。

有人說：我沒有点火、我是被右派利用了。主持点火的是大野心者，被派去点火和一被点就着了的人，身上必然也藏有“焰硝”。幸灾乐禍，企图趁火打劫的人，不管他的野心大或小，显著或潜伏，都要做到自己把它揭露、交代，然后能把它抛弃。这是一个关，出此关就是化外，叫做“自絕于人民”。从这里回头，把野心——杜勒斯把它叫个人主义，总之是一样——粉碎，然后可以回到人民的立場，回到社会主义的立場，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人。

屠刀，不論是藏在衣底或其他秘密的地方，都无法假裝为佛的，只有放下屠刀，才可以立地成佛。

(原載“人民日報”)

雜談帽子

吳松

天气一热，上街总要戴頂草帽，不然，簡直受不住。如果有人戴着皮帽子上街，那大概是发瘋了，至少叫作不正常。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曾經見到过这种反常的事。每逢庙会，总有一批善男信女，他們或因父母害病，或因長輩遭“灾”，在菩薩面前許了愿，只要神仙“保佑”，病去“灾”消，他們甘愿夏穿棉衣冬穿紗，作为报答。在庙会上，我就看到过这种反常現象。过了几十年，人們进步了，这种現象再也沒有看到。

但是，今年又看到了一次，虽然内容不同，反常则一。从春天开始，有些人对戴帽子问题，兴趣浓极了。其中有些是右派分子，兴趣最高，对帽子问题谈得也最热烈。中心的意思是：不要帽子。他们真的是“光头主义者”（对不起，又用了一顶帽子）吗？假的。他们那里是不戴帽子的呀，只是把一切坏帽子给别人戴，把一切好帽子给自己戴罢了。你看，他们给共产党戴了多少帽子呀，什么“党天下”、“无产阶级专政是三害的根源”、“不下台不足以平民愤”等等，数不清的大帽子往共产党头上压，还唯恐不大，唯恐不多，恨不得把全世界的大山变作一顶帽子把共产党压死。他们还在这顶帽子上插满毒草，为的是让人们相信：“共产党是一棵毒草，有帽子为证，理应拔掉”。至于他们自己呢？他们用鲜花编成了一顶美丽的帽子，轻松愉快地给自己戴上了，为的是让人们相信：“我们资产阶级右派是香花，也有帽子为证，全中国都应当开遍我们这种香花”。

原来他们不是不要帽子，而是很要戴帽子，不过戴法不同。他们把人间的一些是非、真伪、善恶、美丑等等观念，也就是他们所说的“帽子”，按照他们的愿望彻底地颠倒过来，给别人、给自己戴上。然而，右派分子的可怜处，在于他们过低地估计了人们的认识能力。右派分子的这套把戏，连我们幼儿园的孩子也会看穿的。上海的孩子现在很少有机会看猴戏，他们也不懂“沐猴而冠”之类的雅词，但是他们绝不会因为猴子戴了人的帽子，就连人和猴子的界限都分不清，何况他们看到一个三分象人、七分象鬼的东西的时候，总要探讨一番：这是好人还是坏人？坏人戴上好人的帽子，是很难瞒过他们的眼睛的，虽然也有人议论过，好象这也是教条主义把孩子教坏了。

为了糾正右派分子造成的混乱情况，必須把帽子作一番調整，各人戴各人的，不但要季节适宜，而且要尺寸恰当，比如是左派称之为左派，是右派称之为右派，香花是香花，毒草是毒草。我們不是光头主义者，决不因为右派分子說我們給他們扣帽子，就不敢說出真理。

右派分子这一回也并不拒絕戴帽子。他們爭取主动，揀了一些他們認為合适的帽子往头上扣。昨天他們还把左派当作一頂坏透了的帽子，今天却宣称他們自己原来早就是“左派”，这頂帽子应当由他戴；昨天他們还罵中間分子是“盲目服从”，今天却急急忙忙說：“我本来就是個中間分子呀！”昨天他們还恨透了說他有“个人主义思想”的人，今天却死抓住“个人主义”这頂帽子往自己头上扣。

他們为什么放弃了光头主义，抓住这些帽子往自己头上扣呢？原来，經過几个月的時間，他們在自己兴起的大风浪里紛紛落水了，眼看自己有灭頂之灾，他們原来对“狂风暴雨”、“迅雷烈风”多么有兴趣，这时却盼望风平浪靜、和风細雨了，漂过来一根稻草，他們也拚命地抓住，希望借此得救，爬上岸来。“中間分子”、“个人主义”，就是他們抓住的一根稻草。

这根稻草能够救他們的命嗎？全中国的中間分子、有个人主义思想問題的人，何止成千上万，但是他們并不反共反社会主义，相反地，他們同共产党合作，在共产党领导下为建設社会主义服务。而你們說你們是中間分子，只不过有个人主义思想，这就不合事实了。你們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并不止是一些“个人恩怨”，而是坚决地站在反动的立場上，瘋狂地向共产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进攻，就是几个月以前，你們的言論行动哪一点

不証明你們是彻头彻尾的右派英雄？怎么忽然这么謙虛了呢？这样是救不了你們的。要想不灭頂，就得老老实实，只在帽子上玩花样是无用的。既然已經下水，就脫掉褲子，彻底地洗一洗你們骯髒的身体和灵魂吧，这比抓住一根稻草有希望得多。

（原載“解放日报”）

右派隱形术

阮廷順

秀才当了賊，就在招供时，也是善于辞令的。其妙处在于，当他被迫在賊証面前承認了罪行以后，还可以把自己裝扮成一个无辜的良民；借以軟化一些人的心腸，擋住別人揭发他更多的罪証，以隱住真形混过关去。右派“头面人物”們正是这样一些貨色。在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們被迫承認了揭发的一些事实；“投降”呀，“請罪”呀，“認錯”呀，“要求寬恕”呀，“重新作人”呀，个个显得誠懇异常。但說到自己是什么人时，却又說并非右派分子。

根据他們自己的說法，他們是各有另外的名号的：黃琪翔是“二十年間……思想上沒有一时一刻离开过共产党”的；譚惕吾是“从抗日战争开始就热爱党，靠攏党，决心跟着党走”的；章乃器是“真金不怕火”，“同那些在政治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沒有任何共同之点”的；黃紹竑是想“跟着共产党后面混进社会主义社会”去的；龙云是主观上的“爱国主义”者；儲安平在“政治上”沒有“勾搭上”罗隆基；叶篤义“远在1952年就在政治上和他（罗隆基）划清了界限”；馬哲民是个“自由主义”者，他同李伯球都是“受毒而不自覺”的。如此这般，个

个都“干净”、“漂亮”的很。

那末他们为什么又都有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行呢？据说这也只是：“立场不稳，为右派言论所动摇”，“容易被右派分子所利用”，“给‘勾死鬼’狠狠地利用了一场”，“不自觉的充当了右派的工具”，“血压过高”而“冲动”了，“不知不觉走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立场”而已，为此，他们“开始还觉得忠心耿耿满腹委屈”呢！

章罗联盟的首脑之一，被上述右派分子指为“受他利用”的“他”，即罗隆基，总应该是一名右派分子了吧，然而据说也不是的，只是对右派分子的进攻，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自问绝对没有推翻党推翻社会主义的野心和阴谋”。不仅自己，就连他的“无形小组织”中的人，也只是“勾结了当地的右派分子”，而并非就是右派的。借用武家坡上薛平贵一句话：“真真地推了一个干净啊！”

彼此都是“被利用了”的，或者仅仅是“助长”者，而真正的右派分子却隐化成虚无缥缈不可捉摸的了；他们都信其有，但谁也无法具体的指出这是谁来。其实，右派分子也还没有神秘化到这种程度，这里玩的是一种障眼的游戏，明眼人是一望即穿的。因为“助长”者原就是“利用”者，“被利用”者即是所谓“被助长”者；他们既然彼此说：“我被右派分子利用了”，“我助长了右派分子”，可见，这“被利用”的和“助长”的，原都是些确凿无疑的右派分子。

然而，这毕竟不是游戏，而是反映了右派“头面人物”的阴险居心。如果听信了他们的说法，就只能对他们高抬贵手。因为既然都是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热心追随者，充其量也不过是犯

了些“立場不穩”的小錯，而且誠惶誠恐“投降”、“認罪”了，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呢？

人們變得聰明了，懂得了對賊是不能講“雅量”的，對於狡猾的慣匪尤其不能講什麼“雅量”，而是要對他們進行更堅決的翻性的戰鬥。隨着時間的推移和鬥爭的深入，“賊”形畢竟是要完全畢露的。馬哲民派人製造“小匈牙利”事件陰謀的暴露，羅隆基新的罪証的揭出，不就是一些例子嗎？其他人的尾巴，終究也是藏不住的。“自作孽不得活”，要想得到人民的饒恕，還是少耍些花招為妙。

（原載“人民日報”）

右派謬論的後面 崔 蒙

孔子說：“聽其言而觀其行。”這句話的本意，原是說，不要光看一個人咀巴子說得好聽，重要的是看他的行為，借以對那種光說不練、專耍咀把戲或者口是心非的人知所警惕。在“大鳴大放”當中，長了很多見識。對孔子這句話也有了新的理解，原來聽右派之言，觀右派之行，才知道右派之言已够惡毒，而在这謬論的後面，还有着這麼多見不得人的陰謀活動。於是 从这里我們也對右派之言了解得更清楚了。

这里可以拿黃紹竑作个例子。這人是民革中央常務委員，人大代表，政治地位是很高的。他對“成績是主要的，偏差錯誤是个別的”這句話，有特殊的惡感。所以他把這句話諷刺地稱之為“公式”，說這“意味着強調成績掩蓋錯誤”，危險之至。因為，據他就司法工作方面的考察，則“百分之二、三的錯誤案件，在

全国范围内不知要造成多少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所以他一再教训我们：“个别错误即仅仅是百分之二、三，也不能用百分之九十七、八的成绩来掩护它。”

就是单从字面上了解，也知道黄绍竑这些话包含着多少毒汁。他首先给我们套上了一条绳子，虽然我国人民的建设成就是伟大的，几年的时间，走了几十年的路程；但黄绍竑硬要我们闭上眼睛，抹煞事实，不要我们说成绩是主要的；否则，他就说你是“掩盖错误”。这有什么结果呢？无非是使我们垂头丧气，迷失方向。至于个别错误，他却唯恐夸张得不够，以至把个别错误所造成的结果，描写得那么阴森可怕。什么“多少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这些话有多么大的煽动性，有多么大的挑拨性，黄绍竑比我们知道得清楚。

我们还可以从黄绍竑的话里，看到更多的髒东西；不过总不如“观其行”，这不但会了解得更多，而且会了解得更深。

熟悉黄绍竑的人，都知道这人对国家的伟大成就从来没有衷心地称颂过，他是专门挑骨子的。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有人提供了一些材料，说他为了找寻党和政府工作当中的毛病，真是挑筋剔骨，无微不至，用尽了心血。当然，谁也不能说不应多找寻缺点，问题在于怎么个找法。就司法机关对反革命分子的处理来说吧，这方面的缺点和错误，是黄绍竑最有兴趣的。但这方面的缺点和错误总有两类：一类是错捕重判的；一类是漏网轻判的。如果真的要研究这方面的错误和缺点，那就只好偏废了。黄绍竑的研究方法很特别，他专找错捕重判的事例，而“有许多反革命案件，重罪轻判，有罪不判的情况，黄绍竑就不愿多发一言。”难怪蒋光鼐说：“黄绍竑好象在‘为民请命’，实际上是在为

反革命分子抱不平”。有什么人能够为反革命分子抱不平呢？这不是太明显了么！

如果再看看黃紹竑对待革命干部的态度，同他对待反革命分子的态度比較一下，那就更明显了。蔣光鼐告訴我們，黃紹竑“对于犯了錯誤的革命干部好象非置之死地而后快”。这話是有事实根据的。所以蔣光鼐要問：“黃紹竑为什么对于反革命分子的处分总是嫌太重，而对于人民干部的处分就嫌太輕呢！这是什么思想？是站在什么立場？”不用問，这是反动思想，反动立場！

說到这里，我們也就弄明白了，黃紹竑所以反对說“成績是主要的，偏差錯誤是个别的”到处找寻錯誤，夸大錯誤，原来是为了尽可能地保护反革命分子，尽可能地打击犯錯誤的干部。不过，他这目的，光从字面上还不能看得十分明白，非看看一下別人揭发的材料，看看他的行为不可。

从这里我們也就得到了一点点經驗，如果听了右派分子的“言”还不能透彻地了解，那就要看看他們的“行”。对黃紹竑如此，对章伯鈞也是如此。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論，尽管說得含含糊糊，人們还是能够从这里看清楚他的心事的；如果再看看別人揭发的材料，看看他的“行”，那他的“政治設計院”究竟是什么东西，也就再明白不过了。在这一点上說，右派分子的行为要比他們的語言明快得多。他們都不是說空話的人，他們的話都是为了他們的行动的。我們不要那么天真地想：“他們发了些謬論，一时失言吧。”不能这么想。他們在发表謬論的时候，那是費了心血的，为的是又能欺騙和煽动人，又能掩护他們自己。

（原載“中国青年报”）

一种右派人物的灵魂

姚文元

沙金同志告诉我，他对“前辈作家”兼“名教授”许杰，过去一直有这样一个人印象，就是他在每次会议上老是说“我感到很惭愧”，每次说，每次说，而且总是装出一脸悲天悯人的模样，令人实在听得难受。“为什么每次会上要念经那样念呢？难道解放后就没有一点进步吗？现在知道了，那是他的一套两面派手法。”

翻了一翻作协上海分会编的“通讯”第四期上许杰的发言记录，分毫不爽，果然他又说“感到惭愧”了，请听他那种做作的声音：“一个作家协会会员如果几年没有作品，就应该取消他的资格。我每次参加作家协会开会，总感到很惭愧。……”

“总感到很惭愧。……”

许杰“惭愧”的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但从这句话里，实在可以看透许杰的灵魂的。

我不想再重复在报纸上揭发的那些材料了，许杰是一个长期以来就有野心的人，他胸藏韬略，深隐杀机，只等待适当的机会，起来给予共产党以“致命的打击”。然而为了不使人怀疑他，为了掩盖他不时会流露出来的内心的仇恨和计谋，他不得不装出自己是虚心、很能自责的人，装出“日三省吾身”随时在进行自我改造的脸容，每次会议时，在转入正文之前来这么一句：

“我总感到很惭愧。……”

记得在北京开宣传会议的时候，许杰在小组会上发言是非常奇怪的。他的发言比谁都“左”，他以为陈其通的文章是对的。

批評陳其通等人反而感到“思想不大通”。接下去又是：“我感到很慚愧，我們要自己檢查一下。……”听那口气就觉得虛假和言不由衷。誰都知道，許杰是一貫反对“棍子”反对得最厉害的，他习惯于把一切对資產階級思想的批評都叫作“棍子”。在去年七月十五日的座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發言中，他就把过去对資產階級思想批判中某些缺点夸大地叫做“看潮頭，揣摩領導的意图，狠狠的打击別人，用来表示自己立場的堅定”，以达到用个别的缺点以混淆根本上的是非的目的。后来他投給文艺月报的短論中，更加露骨地說現在有粗暴是因为思想改造、反胡風斗争搞得太过分了，并且用下流的句子辱罵青年批評工作者是“吃奶的气力”都用光了。這兩段話在发表时是被刪去了，王道乾同志的文章將詳細揭发这一点。怎么他在严厉批評教条主义的时候，反而一下子变成了非常“左”，成为陳其通的辯护人了呢？当时好几个人都百思不得其解，只觉得許杰肚中一定有鬼，但鬧不清楚是什么。現在明白了，他原来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在那个时候故意反常地表現得“左”一些，以掩盖他內心右的本質，使別人感到他是一天到晚在“慚愧”着、自我“檢查”着，放松对他右的方面的注意，然后，在他以为时机到来的时候，突然来一下。这个策略，比当时以反“左”的名义立刻起来反对党的領導要穩当得多，有数十年政治經驗的許杰，不愧为一位有韜略的右派頭目。

在这里，我总算極簡略地勾下了一种少見的右派人物的嘴臉了。这至少对我自己，是極有用的。过去讀“鏡花緣”，讀到多九公、林之洋游兩面國那一回，感到作者的諷刺真是入木三分，如說兩面人“个个頭戴浩然巾，都把腦后遮住，只露出一張正

面，却把那面藏了，因此并未看見兩面”。如說他們說話表面上“无情无緒，半吞半吐”，但一搗起腦后的浩然巾，却是“鼠眼鷹鼻、一臉橫肉……血盆口一張，伸出一條長舌，噴出一股毒氣，霎時陰風慘慘，黑霧漫漫”。這些都是多么生動地刻劃了兩面派的形象！但是也止于贊嘆作者的觀察力，自己的經驗是沒有的。這一回，從許杰的身上，我仿佛活生生地看到這種兩面人了，看到了他的“頭戴浩然巾”的“正面”，也看到了他腦后的“血盆大口”同噴出的“毒氣”“陰風”。濃厚的野心，不斷的“窺測”，異常的陰險同極端的虛偽的結合，這就是許杰的靈魂，許多表面上看去非常矛盾的事實，都可以從“靈魂深處”得到解釋。

（原載“解放日報”）

閑話“政客”

司馬兵

對於二十來歲的青年人說來，“政客”這兩個字是十分生疏的；至於“政客”的手腕則更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最近，全國人民聲討右派分子，實在是幫助我們增進這一方面知識的一個大好時機。

很多人過去對“政客”的認識大概是比較簡單的，大體以為：“政客”是剝削階級社會的政治產物。剝削階級內部由於利害衝突，爾虞我詐，都想搶奪政權，為己所用，於是“政客”应运而生。每一“政客”各認一個或若干個主子，在主子的資助下，在官場中廝混，打聽政治行情，隨機應變，可“左”可右，可進可退，翻手為雲，復手為雨。一朝時來運轉，在內閣中搶到一個重要位子，則既能效忠其主子，又可成為風雲人物；真是利莫大焉。干

這項“职业”的人，頗有点象过去上海証券交易所的經紀人一般；不过“政客”是政治交易所的經紀人罢了。

今天，我們总是天真地想：“政客”的寿命可算是寿終正寢了。这也有根据：八年来，我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是团結的，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也表示要服从工人阶级领导。我們已根本廓清了旧政界那种烏烟瘴气的現象。不过，最近的事态表明：我国政治界在很早以前就有“政客”混入了。这批“政客”把自己的面貌伪装了八年，只是最近才暴露了出来。——这对我們來說，是新聞，也是教材。

这批“政客”的暴露，大大增長了我們的政治見識。这种見識是当前政治課本上所沒有的。就以章伯鈞來說吧，他可說是今日的典型“政客”之一了。解放前，他是靠反共起家的，后来共产党强大了，他就变成了中間路綫派，举着左手同国民党討价还价，举着右手反对共产党，总之是忽“左”忽右，“赶政治市場，搞政治詭詐”（邓初民揭发）。解放的时候，还想搞几十万兵馬，同共产党来个討价还价。这一切拆穿了以后，他就伪装起来，伺机而动。匈牙利事件发生，他以为“政治行情”变了，資本主义看涨，于是就施展出那双“政客”手腕，提出“政治設計院”阴谋控制政局，把中国拉到資本主义道路。章伯鈞和他的同盟者罗隆基、章乃器、儲安平、陈仁炳等这一批“政客”的活动，說明旧社会“政客”的幽灵是还存在着、活动着。他們同旧社会“政客”的区别是，他們吃着社会主义的飯，阴谋推翻社会主义；旧社会的“政客”是吃着資本家的飯、巩固資本主义。这个区别，对我們來說新鮮的。我們过去就不知道，还幼稚地以为我国既已基本上消灭了资产阶级，“政客”也随着消灭了呢！殊不知资产阶

級虽已基本消灭，它的政治幽灵仍在活动，力图死灰复燃。

这还不是阶级斗争是什么呢？

只是，“政客”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消灭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批“政客”同资产阶级社会的“政客”的命运之不同在于：当他一伸出那狡猾的手，就被工人阶级捉住了。这对他们说来，未始不是一出政治悲剧罢？

（原载“文汇报”）

下台与上台

張明

看来，这次向共产党进攻的右派分子有一套很完备的策略和战术。他们的文章先从“只提缺点，不讲成绩”做起，先把解放后的一切描写成“黑漆一团”、“糟糕透顶”，夹叙夹议之余，自己得出一条结论：“共产党已经到了面临危机的时候”。如何突破和脱出这个危机呢？笔锋一转，就提出了一套方案：“党天下”不行，“不能共产党内决定了就干”，要成立政治设计院，或者上议院、下议院，接着，春云再展，出现了画龙点睛之笔：“联合政府”，或者“各党派轮流执政”，简言之，要共产党“下台”。

有人說，章伯鈞罗隆基輩都是中央級的部長，难道还不算也在台上么？答曰：你把这些先生們的雄心估計得太小了，他們要的不只是一个部的权，而是整个国家的权，所以他們盤算着，把民主党派发展到一千万，那时候，“总有一天会請我当总理吧”。

假如單單是为了一个人的职位，那倒一点也不值得惊奇，因为宪法規定，連有任免总理之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滿三十五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誰都

有被选的权利,这里的问题不在于誰当主席、誰当总理,而在于讓具有什么思想的人来领导这个国家,和把这个国家帶到什么方向。那么,讓我們来看看那些要共产党下台的右派先生們的政治綱領吧,他們反对集中,贊成“民主”,反对人民民主專政,要求資产階級“自由”,反对計划經濟,要求无限制的自由市場——拆穿來說,就是不要共产党领导,不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不是直接的“違宪”、这不是公开的对宪法总綱的挑战么?对这种違法的言論和策划,可以熟視无睹、不加批駁和制止么?

要什么人下台、要什么人上台,决定权在于人民,而不在于一小撮野心分子。看吧,才透露出一点要上台的“雄心”,不就已经弄得鼻青臉腫了么?

(原載“人民日报”)

拉誰下馬 情况

王熙凤大鬧宁国府时对尤氏說：“……这張华是什么人,这样大胆。打听了兩日,誰知是个无賴的花子。……俗語說:‘拚得一身剛,敢把皇帝拉下馬’,他穷瘋了的人,什么事做不出来。”“拚得一身剛,敢把皇帝拉下馬”原来是仁人志士不怕肝腦塗地,反抗暴君的一句豪語。但到了阴險毒辣的凤姐嘴里,却用来作为恐吓尤氏,陷害尤二姐的一枝毒箭。

語言本来是沒有階級性的,人民可以用上这句话,人民的敌人也可用上这句话。不过是同一句话,两种意思。

右派分子这次向党向人民的猖狂进攻中,起先是以“言者无罪,聞者足戒”这句话作为掩护进攻的烟幕。听起来好象蛮有道

理，但經不起郭老的一駁：“无罪者的言者无罪，有罪者的言者还是有罪的。”（新华社6月28日电）有綱領有組織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怎么能說无罪？

右派分子明知有罪，但还表示自己“骨头硬”，冒充仁人志士，有一个右派分子說：“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

辛亥革命后，除袁世凱一度称帝外，中国已沒有皇帝，蔣介石潛逃台湾后，大陆上已无独裁者；自龙云起义，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上連一个土皇帝也找不到了。那末，右派分子究竟要拉誰下馬？

在这个問題上有些右派分子倒能“直言不諱”，公然叫囂要共产党“下台”“下轎”。也就是要人民走下历史舞台，讓右派分子登台拜將，恢复資本主义的朝廷。

但結果被拉下馬的不是共产党，不是人民，而是右派分子自己。資產階級右派將从此永远退出人民中国的历史舞台。

（原載“解放日报”）

有这样“坐轎”的人！ 何 健

我們乘火車，一般总喜欢檢个面向車头的座位，也就是說：喜欢坐“順車”，不高兴坐“倒車”。乘電車、公共汽車，或其他交通工具时，我們如果观察一下，就可以发现，人們选择座位大都是以这样的一个标准来决定取舍的。我不懂生理学，但据我猜想，人的这种愿望在科学上大概总有一个根据。事实上，一般人坐了“倒車”，往往容易感到头晕目眩，不太舒服。

这說明了一点：人大都热爱將來，并不迷恋过去。不过也

有例外。

李伯元著的小說“文明小史”里，有一段挖苦崇美前輩勞航芥的話：勞航芥和洋局總辦大人一同走出了旅店，“洋老總讓勞航芥先上轎，勞航芥起先不肯，後來洋老總說之再三，勞航芥只得從命。誰知勞航芥坐馬車却是個老手，坐轎子乃是外行，他不曉得坐轎子是要倒退进去的，轎子放平在地，他却鞠躬如也的爬將进去。轎夫一聲吆喝，抬上肩頭，他嚷起來了，說：‘且慢且慢，這麼我的臉冲着轎背後呢！’轎夫重新把轎子放平在地，等他縮了出來，再坐进去，然後抬起來飛跑。這個檔口，有些人暗暗地好笑。”

勞航芥跨進轎去，轎夫抬上肩頭時就發現自己的臉冲着轎背後，要求轎夫“且慢且慢”，雖然好笑，但他隨即改正了坐的方向，其實還不失為是個好人。今日有些人却不然，他們鞠躬如也的爬進了轎子，轎夫們抬上肩頭，向前飛奔，轎中人面冲着轎背後，却還兀自引以為樂，因為這樣，他們可以依依不捨地看着已經退得老遠的歷史陳迹。

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就是這個樣子坐在轎子裡的。他們還說這是萬分正確的坐轎方法呢。

工人農民們之所以同意這樣的人坐轎子，一則因為他們開頭說過“願為社會主義鞠躬盡瘁”一類的話，二則為的可以使他們充分發揮工作效能，積極地為大家多做一些好事情。既然彼此方向相同，目標一致，工人們也就願意多花一些勞動力，高高兴兴地把轎子抬上肩頭，飛奔前進。

但是轎中人呢？他們身雖在轎中，心却在轎後，眼見得身子所寄托的轎子飛奔前進，所留戀的那一套東西離開自己愈來愈

远，心中那分暗暗叫苦的心情是不难想象的。他们坐在轿子里，对于抬轿子的，非但毫无感激之意，只怕还在咬牙切齿、恨之入骨呢。

看来此辈没有把轿子看作改善工作、提高效能的工具，而是把它当作了暂时蛰居的防空洞，躲在里边，保养身体，待机而动。“机会”果然来了，党要整风了，于是此辈打开轿帘，探出头来，索性以老爷的身分喝令轿夫向后转了。

不但此也，此辈竟还串通一气，个个摩拳擦掌，奋臂而起，分头行事，或钻入火车汽车，或跃上轮船飞机，有的宣扬坐“倒车”的好处，有的叫嚣着要驾驶员滚开，企图把各类交通工具的行駛方向来一个180度的转变。

但是，坐“倒车”总究不是人之常情，解放了的奴隶岂愿再作奴隶？右派分子这种倒行逆施的做法不是已经激起了众怒，大家不是纷纷主张他们滚下轿来吗？

(原载“文汇报”)

算 賬 任 晦

陈仁炳主张算旧账，要求挑几个人出来“有效的”处理一下，否则不足以平民愤云云。对此，上海“解放日报”已经写了一篇社论来反驳。这篇社论的结尾，请读者来判断一下，“这是一笔新账，还是旧账”。

据我判断，陈仁炳要算的显然是“新账”，即解放以来的账；更明白的，是只算共产党的账，不算他自己的账。至于解放以前的旧账呢，他不想算，我看这些先生们也不愿算。因为，假

如認真地算起那筆賬來，右派分子的賬面上似乎并不是很光彩的。

算“新賬”，即解放以來的賬，共產黨可以很有信心地說，算不倒。不論怎樣算，算來算去還是陳仁炳所最不喜歡的那個公式：“成績是主要的，缺點、錯誤是次要的。”這次整風，共產黨的確對自己也在記賬、算賬。因為算不倒，所以有信心，把賬目攤出來，大家一起算。共產黨從來就沒有賴賬的意思，這是早已為歷史事實所証實了。

陳仁炳等右派分子只要算新賬而不提他們自己的舊賬，我倒以為頗有一點賴賬的嫌疑。因為，正如我前面說過，右派分子的舊賬，算起來實在不光彩。陳仁炳先生在上海，就拿上海的右派分子做一個例吧，在上海市政協發言引起了許多人反對的那位魯莽先生（他的官名是魯覺吾），就對我們這批抗戰時期住在重慶的文艺工作者、戲劇工作者欠下一筆很大的債，他是當時國民黨的“審查老爺”，在他的朱筆之下，不知禁過多少戲，多少書，這筆賬，怎樣算呢？

在這一點上，共產黨的確是存心忠厚，不把這些人看作仇人，採取了既往不咎的態度。今天，假如要算這些舊賬，那麼我們不僅可以“挑出幾個人”來，而且可以挑出一批——乃至一大批人來，假如對這批人要處理、而且要“有效的”處理一下，那麼我想，人家又會說我們“缺乏雅量”了。

“解放日報”社論說出了我們歷來的主張：“就是對敵人，包括武裝的敵人，只要他放下武裝，我們仍然主張不算舊賬，實行寬大政策……”。我們過去這樣做，今後也還是這樣做。但是，假如一時的放下武器是假投降，一有機會又重新拿起武器來向

竟进攻，向人民挑战呢？那么，对于这种人，照陈仁炳的“有效的”
处理办法，究竟应该如何处理才好呢？

（原载“人民日报”）

也說“算賬”

常 海

在那些黑云乱翻的日子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們，到处“呼風喚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連，八方呼应”，大喊大叫要同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算旧賬”，杀气騰騰地要把共产党员提出来“好好处理一下！”气势之凶，真真不可一世。

然而曾几何时，时至今日，玩火自焚，右派分子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謔言，終至遭到全国人民同声怒斥。这当儿，右派先生們又施展出他那点“阴暗的聪明”，一面夾起尾巴潛逃，一面又大放烟幕彈。他們不仅怕人揭老底、算旧賬，就連个把月前的“新賬”也賴起来了。罗隆基說：“如有小集团活动，可杀我的头！”章乃器說：“资产阶级已經沒有兩面性——我没有这样說过。”……

時間过去不久，大家記憶犹新，右派先生們何以竟“一反其道而行之”？答曰：一是对己，一乃对人，此一时，彼一时也，右派分子們企图撒潑賴“賬”，蒙混过关。

对于所謂“賬”，無論新旧，我們都敢于和右派先生們“算一算”的。算来算去，“債方”总是在右派分子那一边，賴也賴不掉的。这些日子，对于右派分子提出来和我們“算”的关于“五大运动”、“三大改造”“搞好了”还是“搞糟了”这笔“賬”，

全国人民不是已經用无可辯駁的数字和事实，把右派分子“算”得啞口无言了嗎！

但是，我們却从来主張不分青紅皂白地“算旧賬”。我們是历史辯証唯物論者，对于一个人，我們总是喜欢用发展的眼光去看他。对于右派分子們也是这样。

因为我們国家是世界大国，我国革命的胜利是經過很漫長、很复杂、很曲折的道路的。每一个参加革命的人，也都有着各人的一段复杂、曲折的經歷。这中間，既有毕生为革命流血奋斗的老战士，也有弃暗投明半途回头的“浪子”。今天，大家在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目标下殊途同归，結成一体，虽然有的人过去作了对不起人民的事情，只要今天忠心耿耿，不存二心，人民是会对他“既往不咎”的。

可是，右派分子却恩將仇报，自外于人民，伺有机可乘，便迴馬一枪，丧心病狂地要同共产党和人民“算旧賬”了。他們說：“农业合作化搞糟了！”要农业社把土地归还地主；他們說：“資本主义改造搞糟了！”要公方代表退出工厂；他們說：“肃反运动搞糟了！”要反革命分子“有冤报冤，有仇报仇！”……

对于这些“狼心不死”之徒，那就非要同他們算算“旧賬”不可了。解放八年，他們身列人民之中，却本性未改，处心积虑想取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而代之。所以虽曰“旧賬”，其实也是“新賬”，你今天不將他彻底“算”倒，有朝一日“借尸还魂”，他就要算倒你的！

我們要时刻警惕呵！

（原載“光明日报”）

“真偽有誰知” 东郭迪吉

6月18日“人民日报”所载赵一明揭露章伯鈞在民盟的言行中，有一段話說到：他在对民盟“全体同志的講話中还提到‘周公輔成王’的故事，意思說，一年来民主党派已經成熟，如果党再象以往那样不放手，就会犯錯誤……”。

这一比喻，略懂历史的人誰也会知道只是扯談，并不确切。姑无论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并不象周公与成王那样是“君”与“臣”的地位，就是帮助也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才在同一目标之下共同奋斗的。要說放手或不放手，也应该离不开这一原則；如果仅为放手而放手，任其脱离社会主义軌道，脱离工人阶级领导，我看那就无所谓“輔”（帮助）的义务了。

然而，就他的言行去考察，既以成王自况，就能看出他的“雄心”和“抱負”，而所谓“放手”的实质，也就可不言而喻。这样，我們也就可以从反面找到儲安平所谓“党天下”的注脚了，話出有因，誰能相信儲安平是“独出心裁”呢。

这位右派先生既然喜欢談“周公与成王”，不禁使我联想起历史上有一个有关“周公与成王”的故事了。西汉王莽曾以周公自比（虽然把自己放的地位与章伯鈞有所不同），后人为他做了四句“贊”詞，說：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时；

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

我說这一故事，并不是对这位右派先生有所“不敬”，王莽在历史上另有盖棺定論，而章伯鈞正在“有为”，更不可作为

“身后事”輕下“贊語”；但二者之間，确有相似之处。其关键所在，正在真偽兩字。

民主党派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曾不止一次反复的表示过，天下共知，人民共睹，如今章伯鈞和他这一群，却翻臉不認賬，圍繞一个总的問題，掉了不少的枪花，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要共产党领导，从道德标准去衡量，違背諾言，就是背信背义；如果就目前看当时，就难以使人相信他的諾言，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真偽有誰知”五字，已有客观事实查对，就未必是出于我的主观揣測吧。

我們姑且再退一步研究一下，周公惟慎惟謹，深恐流言及己；而王莽謙恭下士的結果，以古論今，大約就是“靠自己起家”，“发展五十万盟員”，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离开共产党领导，走所謂“中間路綫”吧。

中国有不少的格言如：“日久見人心”，“真金不怕火來煉”。接受社会主义，接受共产党领导，这些花言巧語，为时还不太久，言犹在耳，章伯鈞等右派先生，就如此健忘嗎？

人心是要經過長时期認識，才能捉摸得清楚；鍍金是过不了多久，就会露出黃銅，判断真偽的实际标准，不在嘴巴，而在客观事实的考驗。

（原載“人民日报”）

奉劝魏猛克先生

何平

据7月3日新湖南报載，魏猛克在文艺界座談会上一經大家的初步揭发和批判，立刻就发现“大家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而他本人“受的教育更大”。

何以見得呢？請听：

“現在我深深的体会到，只要离开党的思想与教育一步，就会自高自大起来，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的殘余，就会迅速向右发展，在具体工作中就会产生不健康情緒；个人利益，个人打算也会滋長。”

不再引了，以下无非是“已經逐漸清醒过来”，“衷心感谢党的教导和同志們对我的帮助”之类。

不知道这位深惡痛絕“教条主义”和“八股腔”的魏猛克教授从哪里煉就了这一手本領，竟能即席唱出如此圓熟的八股腔来。誰說知識分子思想改造还没有到頂呀？这岂不就是成績証明嗎？

然而，据7月8日新湖南报載，魏猛克在7月5日作了3小时的发言，仍是并不驕傲自滿，“認為这是由于放松了思想改造，脫离政治，脫离了党的思想教育，所以資產階級思想殘余就迅速向右发展，就站不穩立場，反映在文艺工作上就是严重的右傾。”

算了，不必再轉弯抹角了，还是“粗暴”一点戳穿吧：魏猛克先生，你这簡直連“教条主义”和“八股腔”也不是，而是不折不扣的伪君子的假斯文！

人們不能不問：身为湖南民盟省委代理主任委員的魏猛克先生是“脫离政治”呢，还是积极进行着政治斗争？章、罗联盟处心积慮抓报纸刊物，魏先生則筹办一个报，要登党报所不登的东西，要用英美資產階級通訊社的电訊，何其若合符节如此？魏先生从什么时候起学会了一套办政治报的方針？魏先生与杜迈之召集各民主党派負責人开会筹划办报，并和杜迈之一一起作代

表向中共湖南省委办交涉，难道不是事实嗎？魏先生在省政协会議期間与杜迈之、康德、严怪愚、田洪之流商量“发言”內容，起着交响和合唱的作用，难道不是事实嗎？魏先生排斥高岳森、铁可等共产党员，夺取文联和“新苗”作为陣地，进行你們的所謂“反宗派主义”、“反教条主义”的惡毒攻击，难道不是事实嗎？象这类的問題还可以向魏先生提出很多，难道不也是事实嗎？

好一个“脱离政治”的“资产阶级思想残余”的文人学者呀！

奉劝魏猛克先生，还是老实把右派分子的真实内幕交代出来为妙。

（原載“新湖南报”）

脫褲子 固然

“我們希望，經過外力的推动、生活的体验和自己的觉悟，右派分子能幡然悔悟，接受改造”。換句話說，就是要他們交代問題，“脫褲子”。

“脫褲子”是一件好事，自己揭露自己的丑惡，因而可以抛弃与改变自己的丑惡。

禰衡在曹操的大宴会上，“当面脫下旧破衣服、裸体而立，渾身尽露”；然后又“徐徐着褲，顏色不变”。禰衡所以能这样，正如禰衡自己說的：“吾露父母之形，以显清白之体耳”。右派分子体不清白，失去了父母給他們的原来形态，所以很不愿意脫褲子。

然而人民不讓他們久不脫褲子，爱惜他們的人也看得清楚，大門對他們是开着的”。于是給他們以“外力推动”，小組会、大

会、座谈会、报上写文章，批評揭发，促进他們“幡然悔悟，接受改造”。但是，能不能“幡然”，仍在于他們自己。

許多事实告訴我們，要那些陷溺已深的右派分子“幡然”，是不容易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應該估計到他們这个特点。可能有的右派分子承認脫褲子了，但脫褲子是为着过关，过了关又把褲子穿起。但这不要紧，脫过一次褲子就留下一次痕迹，从前官衙門打老百姓的屁股要脫褲子的，打过的伤痕叫“板花”，“板花犹在”，是下次挨重板子的断語。何况現在脫褲子（当众交代問題）的痕迹，已不是再把褲子穿起所能掩飾。也可能有的右派分子向舞台的丑角学来了乖，他穿有很多条褲子，逼一下，脫一条，再逼，又脫一条，脫到最后，他說，請大家看清楚，我确实脫光了。其实，还有一层和肌膚一样顏色的絲織褲子，遮住他大的丑惡。比如說：我們的思想是一致的，但政治上沒有联系；我的言論的效果是很坏的，但我的动机是爱国的等。这就要我們睜着眼睛，不受他們假惺惺的騙。还有一种死硬的右派分子，說他沒有可脫的，褲子里和褲子外是一致的。甚至說：“把我的骨头燒成灰也找不出反党反社会主义”。是的，現在农村盛行以骨灰肥田，哪是拥护社会主义骨灰，哪是反对社会主义骨灰，是无法找出的。但是你的褲子里实实在在裝滿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的骯髒东西。你不脫，人民要你脫，今天不脫明天还得脫。

脫褲子是件好事。如果你嫌“脫褲子”的話太粗了，那末，改为如周总理說的“幡然悔悟，接受改造”，或者如会上、报上說的：“彻底交待問題”也是一样。

（原載“人民日报”）

謊言和事实

艾明之

讀完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夜已經深沉了。兩天的风雨，給夜晚帶來了撩入睡意的沁涼。然而，我不能睡。周总理的报告，忽然变成一幅一幅生活的图画，在我的腦子里飞旋起来。

三年前，我曾在东北一座边城小住。这原来是一片不毛的荒地，勘探队的足迹第一次踏上这块土地时，滿眼都是藨草，风沙；临到晚上，各种不知名的野兽，就此起彼应地嗥叫起来，大队大队的狼群，繞着勘探队的帳篷轉，銳利的爪子，抓的帳篷嘎嘎地响。不久，各式各样的脚手架矗立起来了，工人，技术人員，党的工作者，……潮水一样涌到荒原上，一座新的工业城市，就象夢一样地出現了。而在今年五一节的新聞紀錄片上，我就已經看見这个工厂的产品巍然从天安門馳过。

解放前，我曾經在一个南方的小村子經過。这个骯髒穷困的小村子，几乎年年都逃不了鼠疫的蹂躪。按照村子的习俗，每一戶傳染鼠疫死亡的人家，就用石灰在門上打一个手印。当我經過的时候，我在每一戶人家的門上都看到这种悲慘的手印。我闖进一戶人家，想在这里寄宿一夜，却发现床上躺着三具尸体，这一家全都染了鼠疫死亡了。整个村子死的死，逃的逃，人烟全无。那种悲慘的景象，給了我极其深刻的印象，我曾在一九四七年写了一篇散文，記下了我当时的情緒和悲痛。解放后，我常常記起这个小村子。一个从南方来的朋友告訴我，在党的大力

工作后，它不但已經擺脫了鼠疫的黑爪，整整三年，沒有在那一家門上出現過石灰手印，而且也擺脫了過去那種貧困。合作社組織起來了，村子上出現了新蓋的茅房，每一戶人家都添了新的東西：被子、衣服或是旁的。……

我猛然想起有一次在一個起重機女司機家里作客的印象。她的丈夫是一個著名的劳模，正在工农速成中學讀書，黨準備幫助他投考大學。她的兩個孩子一個上小學一個在工廠的托兒站里。她在工廠里，以驚人的頑強迅速掌握了吊裝技術，並且超額完成任務，因而贏得了贊譽。當她打開一個破舊的木箱時，她閃着棕色光澤的臉突然蒼白了。她從箱子里，用雙手捧起一塊硬版紙，那上面有兩件破爛不堪的衣服，一是男的对襟衫，一是女的短褂，衣服上有一點點，一圈圈，一灘灘焦黃的痕跡，好象是在火里燒過似的。這是她父母在解放前犧牲的遺物。他們都是紗廠的工人，在領導一次罷工後，四個工賊半夜摸進他們的家，用衣服堵住他們的嘴，把硝酸水迎頭迎臉的潑在他們身上。現在留下來的那兩件衣服，就是他們犧牲時穿在身上的。當我聽着女兒在敘述她雙親死難時，我永遠忘記不了她的眼睛，那是一雙干涸的，燃燒着憤怒的眼睛。

當我讀着周總理的報告時，我的腦子里閃過了許許多多類似的圖畫。這些圖畫是無數勞動人民和無數黨的優秀兒女，用自己的汗以至於血，凝結起來的。這些圖畫告訴了我們，黨和社會主義並不是兩個抽象的名詞，而是我們的依靠和希望，力量和幸福。多少年來，敵人曾經用盡卑劣的伎倆，企圖離間黨和人民間血肉般的关系，他們的陰謀都一個一個破滅了。生活已經讓我們懂得，只有在黨的領導下走社會主義的路，我們才能得到安

乐。国家才能免于貧穷孱弱！

章伯鈞也吧，罗隆基也吧，……一切右派分子們，要想用謊言和污蔑来破坏党和社会主义，結果將是他們自己身敗名裂。他們應該記住一点：看見了事实的人，再也不会相信謊言，不管他們的謊言有多么美丽，动听！

（原載“解放日报”）

弦外之音 以群

民盟的右派分子儲安平認為目前党領導国家“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是“莫非王土”的“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是“党天下”。他似乎很怀念解放以前毛主席倡議的“联合政府”，他認為解放初期“还象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宪法，改組了政府之后，就不象“联合政府”了。

关于目前的国家政权机构是不是“清一色局面”，是不是“党天下”，我以为事实俱在，不值得反駁。只是，今天的人民政权已經不“象”当年毛主席所倡議的“联合政府”，我們倒可以坦率地承認：确是如此，而且已經大不相同。身为“光明日报”总編輯的儲安平应当不会不知道：从一九四五年四月毛主席发表“論联合政府”到現在的十余年之間，中国历史已經有了翻天覆地的大发展，我們打垮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統治，解放了整个大陆，完成了土地改革和农业、手工业、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建設。毛主席在“論联合政府”中就說得很明白：“在中国的現阶段，在中国人民的任务还是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在中国社

会經濟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时，中国人民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我們共产党人从来不隱瞞自己的政治主張。我們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是要將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而今天，中国早已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不管这些右派分子对于往昔的怀恋，历史却是决不会倒退的。

这种貌似糊塗的怀恋往昔，其实并不是真的表現他們怀念毛主席所倡議的“联合政府”，而只是暴露着他們向往資產階級的多党制度而已！如果不信，請看他們“自家人”的补充：一个說，无产階級專政是三个主义的根源，要除“三害”，必須取消无产階級專政；一个說，在国家机关中有了党派組織活动，多一层身分就多一层关系，也就多一层产生矛盾的机会。这些說法尽管各有巧妙，拆穿来看，却只有一个內容，那就是：不要无产階級專政，不要共产党領導，共产党退出一切国家机关！还有一个就說得更加“老实”了，他主張“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輪流执政”。那么一“輪”，自然就輕易地变成右派分子的“党天下”了！

这还不算妙想天开，更妙的是“民盟”副主席章伯鈞的幕后策划，他“面訓”他的干部說，民主党派今后要发展到几百万，“最好搞一个上議院”。这就聞其声如見其人，使人對他們的面貌看得更加分明了！虽然，摸不清他們想搞的是“元老院”还是“貴族院”，但反正他們追求的是資產階級的“兩院制”，这一点灵魂深处的老根的性質，是无可隱蔽的！

这种幕后的策划已經够“深刻”的了，于是上海的“民盟”右派重要人物、“自由出版社”的創辦人王造时就进一步發揮了他們的“理論根据”，他“披肝瀝胆”地說：“美国的法治是認真的。

美国的法治精神仍有好些地方可以采取。”一向关怀美国，至今犹在贊揚美国法治精神的王造时当不会不知道美国有个臭名远揚的“非美活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几年来建立了不少的“勋业”，許多正直的作家、戏剧家、电影的导演和演員——例如卓別林，奧德茨（“千金之子”作者），夏姆林（“守望萊茵河”导演），保罗·罗伯遜，爱德华·魯宾遜，佛德立·馬驅，艾尔·罗宾遜，戴·夏蕙蘭等，都曾被列入黑名單之內，不是被控告、被罰款，就是被迫失业；卓別林甚至被逼得在美国无立足之地，发誓不再回美国，他的新片不仅在美国不能放映，連在受“美援”控制的國家，例如法国，也遭到了禁映。这就是美国的“法治精神”！深知美国如王造时的，能够說明这个“非美活动委员会”是根据美国宪法哪一条的“精神”而产生的嗎？

这一切右派分子的形形色色的花言巧語，說穿了只有一个內容、一个目的，那就是借“帮助共产党整风”之名，乘机表达他們抑压了几年的“心声”——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企图將中国的历史拉回到資产階級“民主制度”的老路上去。

可是，練尖了耳朵的广大人民是不难辨別他們的弦外之音，也不难知道如何对待这种叫嘯的！

（原載“解放日报”）

从“宋江”和“吳用”談起 子西

在整风运动中，有一群牛鬼蛇神妄图翻天覆地，竟敢放出一股股妖魔鬼气，直冲云霄。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講師賀安

就會明目張胆地大发反动謬論，他說：“共产党是人民的參謀部，譬如梁山泊是宋江領導還是吳用領導？宋掌握大權，而吳出對策這不矛盾。”當然，這句話說得非常隱晦；可是，右派分子總是這樣前言不答後語地表白自己的思想，借以施放毒箭的。如果用我們現代人的普通話說來，賀安的意思正是：不要共产党占領“戰鬥司令部”，而要共产党退居“參謀部”；不要共产党作“宋江”，而要共产党去當“吳用”。

參加過戰鬥的人清楚地知道，放棄戰鬥司令部這是意味着什麼？答案只能是：退却，投降，自取毀滅。讀過“水滸”的人也明白懂得，掌握梁山泊領導權的是宋江，而智多星吳用，只不過是一個出計獻策的軍師而已。那麼，賀安要共产党從“戰鬥司令部”撤退出來，想讓誰來占領這個陣地呢？共产党不作“宋江”，又要誰來掌握這領導權呢？賀安雖然假惺惺地說：要“還政于民”，而實際上却是要“還政”于一小撮資產階級的右派野心分子，問題難道不是很清楚嗎？

列寧早已說過，在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是不能平分領導權的。我們如果放棄了無產階級專政，那就只能是資產階級的專政。因為，只有工人階級掌握了領導權，全國人民才能够真正地當家作主；只有共产党掌握了政權，才能是人民的天下。這並不是一句空話，這個結論是為中國人民近百多年來前仆後繼的鬥爭史實所證明了的，是為中國共产党三十多年來領導人民從事革命鬥爭的史實所證明了的，也是為國際工人運動的豐富經驗和歷史所證明了的。右派小丑賀安的謊言，永遠掩蓋不住這個鐵的事實；他的騙人的幌子，永遠也遮蔽不住人民雪亮的眼睛。

还因为，取消了共产党的“战斗司令部”，放弃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权，这是一个人头落地、亡党亡国的問題。我們試想一想，如果“战斗司令部”真是被篡夺了，那时还有什么共产党的“参谋部”可言。

所以，我們說这絕不是什么“不矛盾”的問題，而是根本的、絕对的、你存我亡的矛盾問題。有阶级和政党存在，工人阶级就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领导，共产党就永远不会讓出自己的政权。右派小丑賀安之流的濫言，只有被向前飞奔的历史車輪无情地碾碎，遭到彻底毁灭的下場。

(原載“北京日报”)

假 設…… 夏禹龙

許多右派先生們对于西方的兩党制真是心向往焉，希望总有一天在中国也能实行一番。小子不才，对于西方民主素无研究，仅略聞一二：所謂兩党制者，就是有这么兩個党，大家都提出一些候选人，宣布一套竞选綱領；然后拿到选民中去鼓吹一番；末了来一个投票，得票多的党在台上，得票少的党在台下，如此云云。我在想，如果真的遵照右派先生們的旨意，把这一套在我国实行起来，那末，結局会怎样呢？这样想当然未免有些虛无缥缈，好在右派先生們都是主張“独立思考”的，我在这里略附驥尾，同样独立思考一番，也未尝不可吧！

首先，假設我国在共产党党外另有一个以章伯鈞、罗隆基、章乃器、儲安平、龙云、葛佩琦、陈仁炳諸先生为首的右派联合党。（請原諒我沒有事先征得右派先生們的同意，就擅自代取

一个右派联合党的名称。)

然后，这两个党不免都要宣布一套竞选纲领。共产党的竞选纲领是众所周知的，用不到我来介绍。至于右派联合党的竞选纲领，根据右派先生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大致可以假设如下：

(恕我再一次的冒昧！)

第一条，本党为反对共产党的“党天下”，反对“暗无天日”的社会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

第二条，取消公方代表，“教授治校”，“同仁办报”，共产党退出工厂、学校、农村、机关，退出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科技界、医药界……，“打倒”共产党，“杀共产党人”；

第三条，建立“平反委员会”，对解放以来土改、“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肃反”等运动都进行彻底的“平反”，宣布反革命分子是中国合法的公民；

第四条，定息二十年，取消统购统销，资本主义万岁；

第五条，宣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对不上号”，取消学校的政治课，取消各单位的政治理论学习，取消对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彻底实现“新闻自由”，报纸上美联社、路透社新闻都照登不误，趣味性第一，生意眼第一；

第六条，宣布欠苏联的债一律不还，接受美国“慷慨大方”的援助，向西方“一边倒”，为资本主义而战；

.....

假设上面的纲领宣布了，反映会怎样呢？看来还是会有人赞成的。不是这几天台湾、香港的反动报刊都扬起了一片喝采声，纷纷“表示敬意”，认为这些“意见值得鼓掌”，“应该同情”

嗎？但是我还想对右派先生們进一个小小的忠告：假如你們要拿这个綱領到工厂、农村中去宣揚的話，千万得留神，否則，被工人、农民一頓鉄条、扁担打出来就未免有点儿不好“下台”了。

（原載“解放日报”）

“領導”和“人” 常海

我們国家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庄严地规定了我們国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工人階級——它的核心是共产党——对国家的这种领导地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为近百年来中国革命运动所一再証明了的結論和真理。这在全国絕大多数人民的心目中，本来早已經是不成問題的了。

然而，資产階級右派先生們却偏偏要在这个早已不成問題的問題上大作文章，企图动摇工人階級（通过共产党）对国家的領導权，这真是利令智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

右派分子們假惺惺地說：“工人階級領導，共产党領導，我完全拥护”。可是，一提到工人对企业生产的监督，提到共产党员“作头儿”，他們便大为反感，很不以为然。他們說：“工人也是人，共产党员也是人。所有制一改变，大家就都是社会主义公民了”。

于是乎，什么“不要把工人階級的品質看得高不可攀，神秘莫测”呀！什么“全国无論大小單位都要安排个党员作头儿，是‘党天下’”呀！什么“共产党员大字不識几个，沒有学术地位，不能領導教育、科学”呀！……明枪、暗箭，一齐放了出来。至此，

他們那付“拥护”工人阶级领导，“拥护”共产党领导的假面具，也就完全被他們自己所戳穿了。

因为事情很明白：完全抽掉具体的工人和党员，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也就不存在。而所谓“领导”云云，则更其是空谈，右派分子玩弄的这套鬼把戏，虽然用心狠毒，其实也愚蠢得很！

至于说到“大家都是社会主义公民”，此话虽然不假，却是不能一概而论。首先，并不是所有“公民”都欢呼社会主义的，起码如章氏宗兄弟、罗隆基、储安平、龙云、葛佩琦之辈就不是这样。其次，更不是任何公民都能领导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远的不必说，单从眼前的事实看，如果让资产阶级右派这些“公民”们来领导，中国将要走上什么道路不是已经很明白的了么！

“工人也是人，共产党员也是人”，还可以给他补充一句：“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是人”。但是，人虽同是人，却是左右殊途，泾渭自分，不可以相提并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早就这样告诉了我们，这一次的反右派斗争又使我们在实际的斗争中上了很好的一课。——我们学会怎样看人了。

（原载“光明日报”）

也谈古人

余持平

前个时期，有些单位的鸣放中，常常听到一些古人的名字，如“廖化、黄忠、孔明、阿斗”等等。报章杂志之间，也有所见。

似乎一下子都对“三国演义”感起兴趣来了。其实不然，“欲知心中事，但听口中言”，有些人所以“借古喻今”者，原是另有一番道理。

然則古人云何哉？

曰“当今之世，乃是阿斗当领导，廖化作先锋，以致孔明抱屈，黄忠消沉”，并列举阿斗的种种“劣政”，廖化的样样“低能”，实足以令人髮指”。

那么，怎么办呢？

曰“阿斗应自惭形拙，趁早下台。廖化当缴枪下野，回乡务农。由孔明，黄忠来取而代之，世界才得太平”。

这般论调，当时确令有些人困惑，现在却不陌生，原来是和那些右派头子的谬论一脉相承，而此种居心，则人人皆知其为“司马昭”。

说来说去就是不要党的领导。

如果世界上真的另有什么政党能真正地领导建设起社会主义来，倒也未尝不好，可惜除了共产党外，这样的政党迄今未见。

要不要共产党，实质上也就是要不要社会主义的问题。

或曰“且勿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辈并未反对党的领导，实在看不惯廖化无知，而为黄忠鸣不平耳。”

看来这种“侠骨”，倒也颇具“右风”。

假使真有老将如黄忠者，为革命事业身经百战，而今尚怀才不遇，屈居人下，终日听命于廖化，确是不对的，应当早日考虑调整，发挥其积极性。

但，为孔明者，却也得处处小心，“诸葛用兵，生平谨慎”，升帐点将，就得看清楚，帐下站的究竟是黄忠，还是魏延。

盖魏延生有“反骨”，原存“二心”，不得已表面上表示忠诚，一旦“风吹草动”，以为“蜀中有事”，便要大叫三声：“我要造反！我要造反！我要造反！”

幸而馬岱在背后听得分明，手起刀落，这个“反”才沒有“造”成。

这个故事也是忘記不得的。

故用人之道，还是要“德才兼顧”，德者“对社会主义之忠誠是也”。

而就对魏延的态度來說，古今却还是有所不同，方今人民当政，处处寬大为怀，总希望有华佗来为他抽去“反骨”，端正“良心”，嗣后去邪归正，“共同前进”，如此用心，我看虽孔明在日，也未尝有此仁政。

故談古論今，对我们也不无教益，質之上述的熟讀三国諸公，以为如何？

（原載“解放日报”）

論“哇啦哇啦” 岳軍

民主、民主，多少人为了民主而流血牺牲，又有多少人挂了“民主”的羊头在卖狗肉！国外的資本主义維護者說，我們的議會整天“哇啦哇啦”，多么民主；而你們，总是“完全拥护”，“一致通过”，哪有民主呀。国内的右派野心家也在高唱資产階級民主的頌歌了。章伯鈞說：“資本主义国家的办法是：你不行，我来，我不行，你来。在朝的罵在野的，在野的罵在朝的，这就是活力。”

当然，右派先生們主張資产階級民主，是为了通过議會政治，达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但資本主义国家議會里的“哇啦哇啦”，常常容易給人一种所謂“絕對民主”的錯覺，这种錯覺，在一部分知識分子中是存在的。

不錯，資本主義國家議會里可以“哇啦哇啦”，但是，誰能在那兒“哇啦哇啦”呢？主要是資產階級政黨的代表。美國的參眾兩院里，只有華爾街老板控制的共和黨和民主黨。美國勞動人民在國會里沒有地位。即使在議會外面，人民“哇啦哇啦”也得有個限度，就是說，不得危害資產階級寡頭統治，否則就是“非美活動”。

右派先生們很贊美英國的政治，我們就談英國吧。英國下議院主要是保守黨和工黨，這些黨也都是資產階級政黨。英國人民好象可以在議會外面的海德公園“哇啦哇啦”，但在海德公園以外，共產黨和其他進步組織要舉行競選大會，却常被拒絕租賃會場或被拒絕在電台廣播；競選人還要交納大量資金作保證金。這在實際上阻塞了貧困的勞動人民的真正代表進入議會。當然，英國共產黨有時也能夠冲破資產階級的阻撓把代表送到議會里去，但是這些代表的呼聲照例總是被資產階級的新聞機關扼殺了。可見英國式的“哇啦哇啦”，完全是為了鞏固資產階級的統治，並且是為了欺騙勞動人民的！

章伯鈞說在資本主義國家里可以“你不行，我來，我不行，你來”，這象煞很民主，但“你”“我”都是資產階級政黨，換來換去也是換湯不換藥。試問美國資產階級願意讓美國共產黨出來組織政府嗎？原來資產階級換來換去的是自己的左右手，並且用這種換法來欺騙人民。

右派先生們又說了：我們不要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只要資本主義的議會政治。章伯鈞不是認為中國的社會主義沒有加上英美的議會政治，是件大憾事嗎？他不是說“我愛社會主義，也愛民主”嗎？國際上的右派社會黨人不是在高喊“社會民主主義”

或“民主社会主义”嗎？但高喊“民主社会主义”的英国工党，在过去执政期間，实行了什么社会主义？有了資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經濟制度。社会主义經濟制度只有在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和巩固。如果我们按照右派先生們的意見，真地实行了英美式的議會政治，讓一小批資產阶级政客整天“哇啦哇啦”，到了那时，还想保存社会主义經濟，那未免太天真了，在阶级社会里，超阶级的国家不会有，超阶级的民主也不会有。民主制是和掌握政权的阶级的專政密切关联着的。哪个阶级掌握政权，哪个阶级就决定了民主的本質。我們从不掩盖这一点，而資產阶级总是欺騙人民說，他們的民主是超阶级的。然而資產阶级的阶级利益，使他們不可能給别的阶级以民主。資產阶级所謂的民主，不过是他們一个阶级的民主，甚至是少数壟断資本集团的民主，对别的阶级，只能說是資產阶级專政。資產阶级議会的“哇啦哇啦”，象一件五顏六色的外衣，好象很美丽，然而它掩盖了多少劳动人民的飢餓、貧困、眼泪和痛苦呵！

誠然，資本主义国家的議會政治，較之封建專制制度，是大大地跨进了一步的。有些資本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和共产党，也通过議會进行斗争。但这决不是因为它比我們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有什么优越性，而是因為他們处在資本主义国家里，議會是现实存在的東西。至于我們，既然有了比資產阶级民主制度先进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为什么要倒退过去呢？

我們說，我們这里对人民有充分的民主。人民代表大会上、政协会上，不是有很多人說了話、并且批評了政府工作中的缺点嗎？我們有一致的目标、共同的利益；什么问题經過事先的充分协商和討論，都有可能“一致通过”、“完全拥护”的。我們的宪法，

在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之前，經過了各方面代表人物將近一年半時間的醞釀，最後交全國人民討論，有一億五千多萬人參加，這是何等廣泛、充分的民主！是的，我們的“一致通過”、“完全擁護”，也曾經包括少數混在人民隊伍里的右派分子的假通過、假擁護，但這只能說明他們陰險的兩面手法。這種充分協商的民主精神，和對黨外人士的尊重，即使是右派分子自己，也無法否認的。至於資本主義國家，他們的這個壟斷資本集團和那個壟斷資本集團之間，或者資產階級議員和勞動人民的議員之間，有着不可調和的矛盾，所以不可能有我們這樣的“一致通過”“完全擁護”的。列寧說，資產階級民主是“狹窄的，殘缺的，虛偽的，假仁假義的民主，對於富人為天堂，對於窮人和被剝削者為陷阱為騙局。”（“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而右派先生們偏偏還想兜售這種破爛貨哩！

（原載“人民日報”）

立場問題是客觀存在的

唯 真

我聽到北京大學有一位大學生——他的名字記不清了，他很有“風趣”地在群眾集會上說：“為什麼要把人分成左、中、右三派呢？湖南人喜歡吃辣椒，山西人喜歡吃醋，江浙一帶人喜歡吃甜食，這都是各人的胃口不一樣。人們看問題也完全可能不一樣，有些人比較偏激，可能表現得左一些；有些人比較保守一些，可能表現右一點；有些人採取無所謂的態度，可能在待人處事上表現不左不右的態度，於是人們稱這種人是中間派。其實這裡只存在處理問題的方法不同而已，並不存在立場問題，因此大可不必用‘立場問題’這頂‘大帽子’來扣人家吧！”

他說得那樣輕鬆，事實是不是那樣簡單呢？

其實人們在政治上分成左、中、右三派，並不是根據人們的主觀願望來決定的，這是客觀存在的情況。（如果有人把進步看成落后，或者相反，這是另外一個問題。）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一個人只要不是精神病患者，平時一切的重要言行都必然是從一定的立場出發的，也就是說，這裡必然是反映了自己一定的階級觀點。

為什麼這位大學生學了好幾年的政治常識，連這點道理都不知道呢？如果他不願意向馬克思主義學習的話，那么就請他從右派頭子章伯鈞那兒增加一點知識吧。

被章羅聯盟吸收過去的一位高級知識分子叫做費孝通，曾

經檢舉章羅的罪行說：“在他們（指章羅）看來，思想落后的，对党有不滿情緒的人才是正派人。”为什么右派分子特别喜欢思想落后的，对党有不滿的人，并且認為这样的人才是“正派”的人呢？这是从他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立場出发的一种看法。事实是很清楚的，要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同路人，不是随便可以找到对象的，所以反对我們的人就要从各方面来物色他們所需要的人，究竟誰才能上他們的当呢？这就要根据人們的立場来决定。我們的右派老爷是很懂得这一点的，因此他們在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中就采取了这样的方針：團結落后，爭取中間，打击进步。”（見7月4日人民日报二版）这就是实际生活中的情况。

由于人的立場有所不同，因而就决定了人們走各种不同的道路。这是客觀的規律，不承認它是沒有办法的。当然，人們都可以改变自己的立場的，但要真正改变旧的反动階級的立場，这并不象把穿破了的草鞋丢掉了那样容易，这需要脫胎換骨地改造，玩弄任何手法想逃避这一关，那是无济于事的。

（原載“中国青年报”）

立場的考驗

黑 崖

右派分子有个特点：就是擦粉。有的是自己擦，如章乃器把自己說成为“左派”即是，有的是互相擦，如清华大学党内出現的右派分子說党外右派分子为“进步分子”即是。自己擦，或彼此擦，只不过是一种乔裝，一种魚目混珠的手段。当把他們政治上的老底子、私房話一齐翻出来的时候，人們就能一眼看出，原来

是条狐狸。是右派，沒有錯。

諸如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曾昭掄、黃紹竑、儲安平之流，從他們過去的以及現在的真正的政治態度和政治活動來看，用不着如章乃器說的骨頭燒成灰，人們就看得出他們是右派。認識他們，也比較容易。

對於另外一些人，在人們的印象中，好象一直是左派，現在成了右派，有些人有突然之感，剎時間思想感情上轉不過彎來。轉不過彎來，原因很多，比如不知道底細，只是想着好的一面，總想他不會成為右派，等等。不過，歷史上的經驗證明，每逢革命的轉折點或重要關頭上，有些人，也就是對革命不是全心全意或者是心懷貳志的人，就會受不起考驗，那怕是左派也會蛻化成右派，或者是原形暴露。問題的发生，就是這樣的人，“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他們的思想意識是一定要反映出來的。一定要在政治問題和思想問題上，用各種辦法頑強地表現他們自己。”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里這幾句話說到的，當然也包括貌似“左派”的在內。所以，左派或右派，不是按照人們主觀想法來決定的，而是客觀的存在，人們是按照這個客觀存在，來決定他是左派或右派的。

右派分子攻擊黨的借口之一，就是否定我們的歷次運動，包括思想改造運動在內。從這次反右派鬥爭中看來，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解放八年，到現在為止，有些知識分子的屁股還坐在資產階級交椅里。陰謀取消黨的領導，取消社會主義。問題的性質，不能不是嚴重的。反右派鬥爭，不能不說具有嚴重的意義。人們如何通過這次鬥爭，提高自己，不僅對國家，就是對個人也是關係重大的事。對於我們的知識分子來說，這場鬥

爭，是立場的考驗，也是偉大的政治思想的煅煉。那麼，只有參加到實際鬥爭中來，才能受教獲益。

至於進步不進步，左派不左派，決定於對黨的態度。這是六條政治標準的關鍵性的環節，一切就用這條去衡量，大是大非是很容易弄清楚的。

(原載“光明日報”)

“美國的慷慨” 董代

龍雲說：“借蘇聯的債要還，不如美國慷慨大方”。

借債可以不要還，這個道理只有剝削階級才說得出口，因為按照剝削階級的邏輯，從別人的勞動所得的口袋裡取錢這件事已經是一種習慣；所以借債要還，在他們看來便成為“不公平”了，“不慷慨”了。

不過這還只是半句話。

下面是“不如美國慷慨大方”，這是真意，在龍雲看來，美國是十分慷慨大方的，美國有的是金圓，到處有“美援”，“慷慨”到用軍艦把美援送到尊府，你如不要，美國的“專家們”可以使這個國家的內部來個“政變”，換一個願意接受美援的角色上台，你看這樣的國家是多末的“慷慨大方”，這些事例，在最近中東的事件中已經一演再演，這種“慷慨”已經有目共睹了。

這筆“債”要不要還呢？美國的大老板們真如龍雲所想的那麼“慷慨”麼？但是壟斷資本家到底要比地主高明得多，手段巧妙得多。我想不必舉遠例，就舉近例吧。蔣介石可以說是“慷慨大方”的“美援”下苟延殘喘的標本吧，這筆閻王債是用什麼在償還

呢？是用出卖国家的主权，是用榨压人民的血汗。最近轟动全世界的雷諾枪杀刘自然案，就揭露了蒋介石卖国集团是怎样还这笔债的，台湾的中国人民抗議美帝国主义的暴行却被审判了，美国的杀人犯倒无罪释放了，奴顏婢膝的奴才們俞鴻鈞、叶公超等还要搖尾乞憐的向債主求饒，为什么？因为蒋介石卖国集团写下了卖国契約，这些等等不过是抵还“债务”的最不足道的一部分罢了。俞鴻鈞最后不得不招承，“接受美援，就得接受外交豁免权。”美国人既然在有“美援”的台湾取得了“豁免权”，杀人，奸掠……一切都可以“豁免”了，因为他們是債权人，你借了美国的閻王債，你就得世代代受奴役，人民就要用一点一滴的血来替那一小撮卖国賊們偿还无穷尽的閻王債。

龙云难道都沒有看見么？我想并非沒有看見，倒是从這個問題上反映出他的階級立場和他的階級感情来了。吳茂蓀同志就揭发了这一点，他說：“龙云对于土地改革至今还是余恨未消”，正因为他的地主階級的立場还是十分坚定，地主階級的感情还是十分深厚，又如何不对社会主义、对共产党、对苏联表示他的仇恨呢？也正因此，从他的眼中看来，美国又是如何的“慷慨大方”，而对社会主义国家也就必然要另眼看待了。

他却忘記人民对他的寬待，云南的人民並沒有和他算还积欠下来的旧債，而且还讓他在人民的政权中担任了重要的工作，可是他的心底深处还没有泯灭“往日”的“豪华”，不能忘情于自己的階級利益，因而，“美国的慷慨”也就很自然的流露出来了，又何足奇怪呢？

只是这条不干淨的尾巴又翘了出来。

（原載“解放日报”）

也需要揭盖子

唐 致

自来“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对某一件事，本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些人对这一点看得深，有些人对那一点看得深；有些人从这个角度看，有些人从那个角度看。各人的修养在这里起着不同的作用。这种不同是應該被允許的，否則就无所謂創見，无所謂独立思考，更談不到爭鳴，競賽，互相比較和互相吸收了。但是，除了主观的修养外，还有一个根本的前提，这就是立場問題——它是目前某些爭執中的關鍵。

事实上，也只有在同一前提下，才講得清真正的是非。

不过，矛盾既然产生在人民的內部，他們又早已廢除了古戰場上“來將通名”的办法，短兵相接之际，决沒有人肯挺“矛”大呼：“吾乃資產階級大將某某是也”；相反地，他們总是把自己的立場隱蔽起来，裝成一副公正的臉孔，这就是为什么章乃器要熱中于解釋資產階級已經沒有兩面性；为什么章伯鈞只肯說他是为右派所利用，而不承認自己就是右派；为什么有些人过去腦子里根本沒有工农二字，現在忽然要以工人农民的代表身份來說話。这种情况是值得我們思考的。我們应当欢迎資產階級的成員逐步地向劳动者轉化，却不容許在劳动者的名义下販賣右派分子的私貨。自己不報名，这就應該把他点出来。

我覺得現在正是鍛煉我們辨別能力的时候。

不管右派分子怎样諱言立場，事实上，“言为心声”，立場問題还是一个客觀的存在。不过反映在言行上，有些較为显著，直接，一望便知；有些却較为隱晦，曲折，通过具体問題才有所反

射。屬於前者，譬如說，有人認為共產黨領導得一塌糊塗，“暗無天日”，統購統銷搞糟了，肅反運動搞糟了，應該“自請處分”，趕緊“下台”，否則“群眾”就要打倒共產黨，殺共產黨人；或者說生活水平提高是假的，自己以前乘火車坐軟席，現在却坐了硬席等等。真所謂“開口見喉嚨”吧，我們只要聽一聽，再睜開眼睛看一看，立刻覺得涇渭分明，知道這是代表什麼人在說話了。可是對於後者，却還得多費一點唇舌，才能揭開他們的蓋子——我以為這裡也的確有個蓋子。

表面一套，背後一套，善於玩弄兩面派手法的章伯鈞不必說了，即以章乃器而論，也有一個蓋子，他說：“這個時期的思想工作肯定會遇到許多新的問題，現在是從壓服走向說服的階段，要說服就要相當高的理論水平、政治水平。”言下之意，無非說他倒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已經看出了許多“新問題”，別人不能說服他，因為理論水平、政治水平都太低，章乃器一天不服輸，也就一天不會離開這個理論家的首座，據我看，即使馬克思重生，也很少有可能說服他。譬如說；章乃器說中國的資產階級是“紅色資產階級”，如果我們根據馬克思對資產階級的本質的分析，說明資產階級只有在特定條件下，才会有進步的一面，而且只是一面而已，不可能有什麼“紅色”資本家；他就索性抓住這一面，拋棄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否定剝削本質，認為中國的資產階級沒有兩面性。李康年主緊定息二十年，由政府發行贖買存單，立刻摘去資產階級的帽子，既得厚利，又摘帽子，這還不是資產階級名利雙收的思想本質嗎？然而章乃器却把他說成是“想早點消滅資產階級”的一種進步表現。不揭去這個詭辯的蓋子，還有什麼是非可說呢？

是非的标准不同,当然就不可能说服他。章乃器自以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学说,实际上,却走到华尔街大老板们的膝下,在高唱“资本主义优越性”的老调了,人们不可能在这里看出什么“新”东西。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一句话:立场问题。

有人认为把章乃器、罗隆基、章伯钧与葛佩琦相提并论,未免太不公道。其实呢,这里并不存在着什么公道与不公道的問題,老子说过:“与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由我看来,偷天换日,诡辩惑人,前者的作用倒要比后者坏一些。

(原载“解放日报”)

关于“卫道者”

盧文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卫道者”这名词风行一时。

看有些人罵“卫道者”时候的那股咬牙切齿、“嫉惡如仇”的勁头，簡直令人以为真理和正义都在他們这一边，只有他們才是整风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而“卫道者”，却仿佛成了阻碍整风运动的罪人。

看来，在罵人为“卫道者”的与被入罵为“卫道者”的之間，确是有点势不兩立。例如，有人說新社会一片黑暗，缺点象雨后春笋似地在各处滋長；有人反駁說，新社会阳光普照，只有少数角落是阴暗的；新社会的成績是根本的，缺点和錯誤只是局部的，个别的；于是，反駁的人被罵为“卫道者”。有人說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产生的根源在于新社会的制度；有人反駁說，产生的原因在于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于是，反駁的人又被罵为“卫道者”。諸如此类，不一而足。总之，凡对于非难与攻击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論調起而反駁的，凡对于否定党的领导的言論要說几句公道話的，凡对于反社会主义、反无产阶级專政的意見不愿苟同的，莫不有可能被另一些人罵为“卫道者”。而罵人为“卫道者”的人呢？无疑是以“超越偏見”，“真理化身”自居的。

其实，世界上原就有着各种各样的“道”，而且各有其信仰者、宣傳者和卫护者。这些形形色色的“道”，有的一眼就能看穿是邪道，如封建主义、資本主义便是；有的則是正道，如馬克思列宁主义便是；此外还有些旁門左道，如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便是……。

本来，此“道”与那“道”之間展开交鋒、斗争，这原是不足为怪的。問題在于在新社会里，明目張胆的邪道不容易找到市場，因而那些罵人为“卫道者”的人，常常打起了各种幌子（譬如，他們大喊：“我們要帮助党搞好整风运动”）。在这些幌子的掩盖下，为了使人家开口不得，他們又采用了“先发制人”的战术，抬出“卫道者”的名詞，企图把人家罵倒、罵散，自己就可为所欲为。遺憾的是幌子毕竟是幌子，所以常常不能遮住他們的“廬山真面”。举最近情况为例，虽然有极少数人被他們的幌子迷惑了，被他們用“卫道者”这名詞罵倒了，而絕大多數的人却在咒罵声中勇敢地站了出来，把他們的幌子撕得粉碎，讓全国人民都看清了这些人的“廬山真面”，却是那样丑惡。

由此可見，真理不怕爭辯，真理越辯越明，是是非非或是非非是，才是考驗一个人参加整风运动的动机的关键所在。

写到这里，不由使我記起魯迅說过的一段話：“生在有階級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階級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学会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現在而要做給与將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沒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南腔北調集”）

漂亮的口号是好听的，但是在漂亮的口号后面，常隐藏着最不漂亮的东西，請問，那些罵人为“卫道者”的人，你們是否也是“卫道者”呢？你們卫护的到底是什么道呢？那些被人罵为“卫道者”的也可以想想，只要是馬克思列宁主义之道，难道不該把它卫到底、卫彻底嗎？

（原載“中国青年报”）

談“但丁派”

王 城

右派分子猖狂进攻，放出許多毒箭，其中之一，就是什么“但丁派”。

把这支毒箭拿来化驗一下，看看有多大的毒性，倒是一件頗有意义的事。

据說，“但丁”者，即但盯着领导眼色行事也。其諷刺挖苦之意，就不消說了。

有人听到这个名詞以后，竟然叫絕！叫妙！絕者，妙者，說是因为狠狠地諷刺了那些“拍馬的”、“阿諛逢迎”的人。

我却不同意这种看法，并且觉得有这种看法的同志似乎被迷魂药迷住了。

阿諛逢迎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和右派分子有着“血統”的关系，二者只会相吸不会相斥。

我們有些同志虽是書生，但却缺少一点学究气，如果稍稍考究一下：当蔣介石但盯着美国主子眼色行事的时候，右派分子是什么态度？当资本家的走狗但盯着资本家的眼色行事的时候，右派分子是什么态度？这样就会恍然大悟了。

不要只看旗，不看人，否則就会上当。

右派分子打着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旗，实际上在攻击那些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的人，这不是很明显的嗎？

反对社会主义，自然就会反对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反对共产

党，自然就会反对跟着共产党走的人。这是科学的逻辑，也是真理。

要反对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的人，但又不敢直说，于是就嘲之、諷之：“但丁派”！

一点不错，那些坚决跟着党走的同志，确实是但丁派。他们但盯着社会主义，但盯着共产党，一步不移，完全一面倒。他们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不图私利。他们相信共产党，相信党的领导同志，积极去领会党的方针意图，争取和党的步调完全一致，争取做党需要做的工作，争取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的战士，把自己的一切献给革命事业。当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他们但盯着革命的成果，坚决加以保卫，一丝一毫也不放松，并且勇敢地站在最前线，和右派分子短兵相接。他们就是这样的但丁派。

这样的但丁派，真可使人叫妙！叫绝！真是妙得很！好得很！我们需要这样的但丁派！我们还要歌颂这样的但丁派！

正因为这样，所以右派分子就更加痛之在心，恨之入骨了。

于是，就挑拨加造谣：“为什么要去做人家的儿子、孙子、徒子徒孙呢！党的圈子只有一千万，圈子外面还大有文章可做。党相信的人未见得都好……。”

于是，就胡说八道：“什么马列主义，都是刻板的脑筋。马列主义是一种手工业，马克思、列宁见过原子能吗？马列主义也是要变的。”

于是，还要漫骂：“应声虫”！“唯唯诺诺分子”！“小丑”！

.....

对一个革命者来说，一切漫骂、嘲笑、侮蔑都算不了什么。要革命就要战斗。要战斗，那就什么都会碰到。只是他们要随时随

地保持革命的嗅覺，不放过那些有毒的东西，不管它披着什么美丽的外衣。

應該看出，右派分子罵那些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的人“但丁派”，这决不是发泄一时的气憤，也决不是阿Q那样的精神胜利法，以罵人自慰。他們是有战略方針的，即：“团結落后，争取中間，打击进步”。他們是有手段的：打击、挑撥、欺騙并用。他們知道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的人是党的助手，是社会主义的保証，是革命的骨干。他們知道要打垮共产党，就必须击垮那些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的人，使他們感到迷惑，使他們从羞于接近党，慢慢和党疏远。从而把党孤立起来，以便一举消灭之。

这是右派分子的妄想。自然，他們永远也不会达到目的的。然而，这是毒，我們要警惕！

（原載“文艺报”）

清 君 側 江 流

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同时，对于一向靠攏党的积极分子也放出一連串的冷箭。他們罵积极分子是“打牆挖溝的‘义勇队’”是“京戏‘审头刺湯’里的湯勤”。有人只因积极分子說了几句公道話，便暴跳如雷的罵积极分子“无耻”。右派先生們为啥这么忘形失态的仇恨积极分子呢？其实，并不难理解，不过是他們向党——这一中心堡壘进攻时，所进行的外圍扫蕩战罢了。右派先生們象我們一样清楚，积极分子是那些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并且在建設社会主义社会中起积极带头作用的人們。象这样功在人民的人，反被右派所憎恨。那么，我們不禁要問，右派先生所

喜愛的是哪些人呢？當然，應該是那些反對共產黨、不同意社會主義，或者在建設社會主義中消極怠工的反動分子嘍！

右派分子把積極分子比作“湯勤”，言外之意，共產黨就是“大逆無道”的“嚴嵩”嘍！按着右派先生的看法和邏輯，湯勤自然該殺，難道嚴嵩不也該打倒么？（在這裡嚴嵩二字，應被理解為共產黨）至於右派先生詆毀積極分子是“言不由衷”，“隔離黨，隔離群眾”，“別有企圖”……等等。古人云：“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右派的企圖昭然若揭。是想要在黨和積極分子之間挖條鴻溝，使積極分子遠離黨，變成“過街老鼠”。從而，把黨在群眾中孤立起來，然後，便於他們向黨作更猖狂的進攻，使黨象他們幻想的那樣，一進攻就“下驕，下台”，最後，他們取共產黨而代之，好走資本主義之路。

在這裡使我想起中國歷史上許多“清君側”的故事。右派先生所以向積極分子這麼猛烈的開火，正是這種策略的應用而已。可是，夢究竟還是夢呵！右派先生們弄巧成拙了。到頭來，變成“過街老鼠”的，不是積極分子，而是倒霉的右派先生們自己。現在右派集團不是已成為全國性的人人喊打的對象了嗎？

也許有人不同意我這套“小題大作”的看法，認為右派不過是對積極分子進行一般的善意批評，何足大驚小怪呢？情願我幸不言中，犯一回主觀主義的錯誤。可惜，事實昭彰，真理俱在呀！應該聲明的，我並不是說積極分子沒有缺點，或者有缺點也不該批評，不，我毫沒這個意思。我的意思是右派先生站在什麼立場上，採用什麼態度去批評？關於這一點，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中說：“對廣大幹部和積極分子不要潑冷水，而要幫助他們”。難道從右派先生們的粗脖紅臉和咬牙切齒的謾罵中，你

嗅得出哪一点是属于这种善意的帮助呢？况且，这次积极分子所遭受的恶毒污蔑，远远超过泼冷水的程度，而被骂得狗血喷头哩！

（原载“北京日报”）

談积极分子

何平

陈孝禱教授在大学課堂里大罵积极分子。皮名举教授写有煌煌大文，宣布要消除共产党“領導上專政的威风”和“积极分子的歪风”。文人(?)康德則站在省政协的講壇上指着积极分子們的鼻子大罵。

右派分子无有不痛恨积极分子的。

反对共产党而不反对积极分子，做得到嗎？那岂非“不近人情”嗎？

右派分子进攻的方式倒是不一样，并不完全“公式化”。有的是把共产党、共产党员、积极分子一起罵倒，有的是“拥护共产党”而扫除一切共产党员（当然，曾彥修之类的党员，或如湖南省肖云端、周微林之类的党员，那不在他們扫除之列），有的是姑且把共产党员按下不表，專門剪除积极分子。凡响应和支持共产党号召的积极分子都被右派分子罵为走狗，奴才，或是稍为隐晦一点、巧妙一点，罵为“假积极分子”。当康德在政协講壇上喝問“你們积极分子为什么不积极了！”的时候，真有旋轉乾坤的妙用，好象康德倒成为共产党的“真积极分子”了。

右派分子若能搞得积极分子人人自危，都不敢靠攏共产党，更不敢向党汇报工作和反映群众思想情况，那时共产党即使仍

不接受右派分子所提出的“取消汇报制度”的建議，共产党也已經孤立起来，成了聾子瞎子，“斯亦不足畏也已”，不必再用力去反对了——但其实决不会如此从寬发落，你只要看看章伯鈞、陈炎文、楊繼华之流所津津乐道的“匈牙利事件”吧，在那里，共产党人遭受着什么橫禍还不明白嗎？（当然，右派分子也应该看看反革命分子在“匈牙利事件”中是怎样下場的！）

在右派分子猖狂进攻之下，确乎也显露出了“假积极分子”，他們也認為世道变了，“形势不同了”，再跟共产党走就要倒霉了，而他們本意是只可行运，不可背时倒灶的，所以他們反过来成为杜迈之、康德之流身边的积极分子。而事实証明：右派并不是在原則上反对积极分子的，相反，他們一直在惨淡經營，培养和收买他們所需要的积极分子，并且他們也仍旧实行“汇报制度”。然而，使右派分子大为扫兴的是，从共产党身边跑开去的假积极分子只是极少数，絕大多数則不为右派分子的辱罵和恐吓所动，反以受到右派分子的辱罵和恐吓为荣。

（原載“新湖南报”）

續談积极分子 何平

或問：“我曾对积极分子提出过批評，并且我見有些人对积极分子講过些尖酸刻薄的話，是不是也列入右派？”

我以为这中間是有界綫可划，也是應該划清的。右派分子无不痛恨和攻击积极分子，但我們决不可以把一切对积极分子有意見有批評的人当作右派。积极分子在提高自覺的时候，自己也感不滿，也批評自己，可見，积极分子是需要批評和欢迎批

評的。一般來說，在各種政治事件中涌現出來的積極分子，能夠帶頭擁護和響應黨的號召，勇敢奮鬥，是非愛憎比較鮮明，因而在共產黨和廣大群眾之間起了橋樑或紐帶的作用——而決不是起了阻隔和破壞的作用，假如是起阻隔和破壞作用的話，右派分子早就對他們“歌功頌德”了，何至會咒罵？但積極分子是逐漸培養和涌現起來的，覺悟程度是逐漸提高，能力也是逐漸加強的，並且不可能整齊劃一，高低強弱不一樣。有一些積極分子由於有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個人英雄主義等缺點，往往不虛心，不細致，辦事情簡單生硬，強迫命令，這就使他們在聯繫群眾的過程中又有脫離群眾的缺點。許多人對積極分子的這些缺點提出批評，雖然在某些具體對象和具體情節上不一定正確，但在原則上是正確的，並且是善意的，因為他們並不是要把“積極分子”（實際是指靠攏共產黨的積極分子）這個名詞搞臭，使人不敢做積極分子，也不是象陳孝禪那樣地叫囂：“你們的歷史使命已經結束了，你們再不要干這個行業了！”群眾把積極分子看做自己一家人，承認他們的功績，需要他們，因此也批評他們，責望他們。右派分子則和一切反動分子一樣，把積極分子看作仇敵，罵他們為“干這個行業”的“走狗”、“爪牙”，罵他們“為虎作倀”、“無耻”。群眾在批評積極分子的時候，也批評共產黨在領導和教育積極分子方面的缺點，要求克服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加強對積極分子的領導和教育。右派分子則根本是對共產黨本身妄想“一棍子打死”。所以兩者之間是截然不同的，是有界綫可劃，也是應該劃清的。

至於群眾中間也有人對積極分子採取尖酸刻薄的態度，我以為那也不對，是落後的表現。對於有這種態度的人，可以教育

說服，只要他對人對事能夠跳出自私自利的圈子，改從六億人民出發，從團結的願望出發，他們就會有正當的批評態度。而且對於這樣的人應該及時加強教育，否則他會很容易上右派分子的當，跟着右派分子走到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黑道上去。

至於在積極分子中也混雜有極少數的假積極分子，他們假公濟私，陽奉陰違，表面“為人民服務”，實則欺壓良善，包庇敗類，這是實際生活中“難免”的事，但也只占極少數，不可能多，也不可能久而不敗露。然而，必須指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對於這種假積極分子“不患寡而患不多”，因為這是他們的同盟軍，是他們所愛護的人而不是他們所攻擊的人——要攻擊的話，那也得在他們的具體私利發生衝突的時候。

（原載“新湖南報”）

積極分子萬歲！ 天馬

胡風反革命集團曾經罵積極分子是“螻蛄”，是“向上爬的蛆蟲”，狗嘴里哪能出象牙，且不去管它。現在，右派分子在向共產黨進攻的時候，狼牙棒揮舞的對象之一，仍是積極分子。他們罵積極分子是“護城河”；是“築牆挖溝的義勇隊”；是“牆外的鐵絲網”。有的人甚至把積極分子說成是“比狗屎還臭”。在這些人看來，積極分子真是一無是處，罪該萬死了。有一位先生曾說“一棍子打死官僚主義未嘗不可”，我看有些人真是企圖一棍子打死積極分子哩！

否定一切，罵倒一切是容易的，動動嘴巴就行；問題是這樣信口開河，臭罵一通，痛快固然痛快，可就是罵不倒，也否定不

了。

罵积极分子的大概有兩種人。一种人自命清高，看見积极分子接近领导，就說是“吹牛拍馬”；看見某些积极分子有缺点錯誤就把所有的积极分子都否定了。其中有些人是因为在“三反”、肃反运动中受到了誤伤，对积极分子怀恨在心，趁这次整风的机会来发泄和报复一下，他們对积极分子不是采取“治病救人”，帮助改正缺点的态度，而是抹煞一切，罵倒一切。这种人我这里不多談，我相信經過这次运动，他們是会多少受到一些教育的。

值得注意的倒是另外一种人，他們之攻击和詆毀积极分子是別有用心的。积极分子是党和群众联系的紐帶，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在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設中都建立了偉大的功績，积极分子不是臭得很，而是香得很！这本是众所周知的事。那些別有用心的右派人物不是沒有看到这一点，相反的，他們正是看到了这一点而怀恨在心。他們想趁共产党整风的机会来混水摸魚，企图变天，要共产党下台。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們沒有群众基础。虽然有葛佩琦、王德周之流出来冒充代表人民說話，但結果証明，除只能代表他們自己和与他們同类的一小撮人之外，誰也代表不了。因此，社会主义的事业愈前进，共产党的力量愈大、威信愈高，这些先生們的反感也就愈大；共产党与群众的联系愈紧密，他們也就愈感到自己的势單力弱，孤掌难鳴。但是他們又不甘心于希望的幻灭，还想与共产党决一雌雄。胡风反革命集团曾經对党进行“挖心战”，而右派分子們却选用了“挖根”的战木，他們要挖共产党的根，砍断共产党的左右手，使共产党在群众中孤立起来，于是他們选中了积极分子作为攻

击的目标。战术不可謂不巧妙，手段不可謂不毒辣了。奈何天不佑人，事情不那么称心如意，被孤立的不是共产党，而是他們自己，他們的本来面目在群众面前更加暴露了！

說积极分子是“护城河”，是“牆外的鉄絲网”，我看比喻得很好，积极分子正是护社会主义之“河”，护社会主义之“网”，当这些別有用心的阴謀家們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时候，他們不是已經挺身而出予以有力的反击了么？

积极分子是人民的驕傲，是无价的財宝，愿新的积极分子更多地涌現。我要高呼：积极分子万岁！

（原載“人民日报”）

陈孝禪搞什么鬼 何平

湖南师范学院教育系主任陈孝禪利用在課堂里講学的机会大罵积极分子，宣布他对积极分子“深惡痛絕”。他罵了些什么，射出了多少次毒箭，这里不論，暫且只介紹他“夫子自道”的一点經驗之談：

“見了积极分子，我就来一个‘四通八达’，說兩句进步話，打发他們走。”

这大概是一个妙計，連同魏猛克教授的“几年来发言都不是自己的真实思想”，都可以收入資产階級右派的“驗方新編”。

不过，陈教授想必也很苦吧，积极分子是多得很的，并且不断涌現出来，要“打发他們走”，怕要經常善于說假話才行，有时候似乎还得“主动”一点，不等“見了”积极分子，只要聞到风声就伪装起来。

有些人可能記不起了，在20多天以前，正当湖南省对右派斗争序幕揭开，杜迈之的狐狸尾巴已被拉了出来的时候，民主促进会长沙市筹委会副主任委员陈孝禪（就是在师范学院利用系主任身分在学生們中間点火的那个陈孝禪）連忙发表題为“駁斥反社会主义謬論，繼續大放大鳴”的書面談話，送到新湖南报，在6月20日登了出来，在发了一段“四通八达”的議論之后，陈孝禪居然指名指姓地說：

“少数別具用心的，如葛佩琦、王德周、楊玉清、儲安平、陈新桂之流的右派分子，利用党整风的机会，以为这是找到了一道缺口，于是毫无忌憚地发表各种危害社会主义的言論，企图向党、向人民民主制度进攻，其他如章乃器、章伯鈞、罗隆基、黃紹竑等，則以馬列主义为伪装，实际上販賣资产阶级的私貨，在人民群众中进行欺騙。”

請你原諒我把陈孝禪的話引了这么多，我实在不能割“愛”，我并且还想說服你把全文找来看看，那才更足以見他是怎样“与这些右派野心分子坚决划清界限”，怎样“坚决站稳立場，維護社会主义的最高利益”。还應該特別指出，最精采的部分还是他对于中共湖南省委和長沙市委决定中、小学暫不进行整风，集中力量做好毕业生的工作，表示“完全贊同”。为什么这点最精采？因为他在这一点最能“四通八达”，最能起“打发他們走”的作用。

奇怪的是，陈孝禪何以在6月20日以前10多天內不表示态度？民进筹委会秘書長王果利用民进組織在中小学到处点火、搗乱，何以陈孝禪一直裝聾作啞？等到王果的反动言行被揭穿之后，陈孝禪裝做大吃一惊，“我一点也不知道！”这样做，难道

真能“打发他們走”嗎？

在民进長沙市筹委扩大会議上，許多人說陈孝禪决不脫責任，并且指出陈孝禪自己在省政协会議上的发言，就是別事实加以夸大和渲染，企图挑起广大小学教师对党和政滿。希望他彻底交代。（見7月9日長沙日报）

王果——陈孝禪——杜迈之——……其中搞的什么鬼

（原載“新湖南报”）

“唯唯諾諾”和“独立思考” 原 东

的什么听到右派分子攻击我們的黨員、團員和积极分子“唯唯南報”，都是“不想事情，不說話的人”的时候，我的心里总要这件事情：

那是5月的北大，譚天榮、龙英华、刘奇弟等右派分子正一时，他們罵一切反駁他們的人是“卫道者”，是“教条主义”。我們的黨員、團員和积极分子也給他們以迎头痛击，沒張右派分子的大字报不在当天，或是第二天清早，立刻遭到的。黨員張焜、團員江楓等三十多名同学更針鋒相对地貼“卫道者論壇”，他們宣称：

“有人說我們是卫道者。

是的，我們是卫道者，我們捍卫社会主义，捍卫馬列主义之

正因为我們是卫道者，我們坚持真理，反对空洞的呼喊，顛黑白的叫囂。”

这是一场庄严的战斗，是好人，是坏人分辨得清清楚楚。右派分子攻击我們积极分子：“不想事情”，沒有“独立思考”，然而这场庄严的斗争証明我們的积极分子是最能想事情，是会独立思考的。在当时，正是阴风惨惨，牛鬼蛇神一起出現的时候，何去何从，要自己判断，自己选择。然而我們的这些党团員絲毫不为什么妖魔鬼怪所动，清醒地站在党的立場上，坚定地捍

卫着馬列主义。如果不是最会思考問題，怎么能在这紧要关头分清大是大非？事实就打了右派分子一記响亮的耳光。

然而所謂“項庄舞劍，意在沛公”，右派分子攻击我們“唯唯諾諾”，沒有“独立思考”，目的在于挑撥我們和党的关系。他們实际是在說，“为什么共产党說什么你們就听什么？嘖嘖，唯唯諾諾，不中用，你們不应当受共产党的話的約束，应当自己去思考。”我們說，敬爱的先生，我們偏偏要讓你們大失所望，我們心甘情愿地在党的教导面前“唯唯諾諾”（姑且用这个詞儿吧），因为我們知道只有老老实实地听党的話，才能真正用馬列主义武裝自己，才能保證革命队伍思想行动上的統一。这对社会主义大大有利，只有对右派分子才不利。因为这样一来，他們就不能再迷惑人，不能再拉攏人，他們的阴谋就要破产了。

在我們看来，对党的“唯唯諾諾”和对問題的“独立思考”，不仅不是对立的，而且是相輔相成的。我們独立思考的目的，在于使我們的思想更活跃，更适应社会主义建設的要求，更符合客观条件。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用馬列主义思想作指导，就是說，需要首先以对党的“唯唯諾諾”为前提。离开这个前提，就是越軌的思考，結果就必定背道而馳，跑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林希翎、譚天荣就都是这种出軌的“英雄”。更不要說他們的反动立場了。他們貌似“独立”，倘認真檢查一下他們的观点，其实質的荒謬，其邏輯的混乱，实际上正是站在反动的立場上。承襲了資本主义的渣滓，哪里有什么“独立”和“創造”呢？

相反地，象張焯、江楓等同志，正是以在党的教导面前“唯唯諾諾”为前提，才有出色的独立思考。他們毫不躊躇地判斷

出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毫不犹豫地明确自己应当站在哪个立场上。一个青年的“大智大勇”正是由此而生的，他们根本不屑一顾那些非驴非马的胡思乱想。

因此，我们绝不上右派分子的当，他们是在恶意地煽动和挑拨，我们完全能识破他们的鬼把戏，彻底粉碎他们的阴谋。

（原载“中国青年报”）

到底谁是“木脑瓜”？ 孙殿旺

在党号召我们全国人民开展反右派斗争时，学校里的右派分子公然污蔑青年参加反右派斗争是“木脑瓜”；“共产党叫你反右派，你就反右派，不好好的想一想，真是木脑瓜！”

右派分子的“独立思考”原来是这样的货色：他们的所谓“独立”就是要青年站在和党对立的立场上反对党！他们的所谓“思考”就是要青年拿着放大镜去寻觅党的缺点，去道听途说，捕风捉影，最好是造谣中伤！谁反党最坚决，骂党最恶毒，他们就是最能“独立”，最会“思考”的“英雄”！真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右派分子企图在“独立思考”的幌子下，要青年对党的政策，对党的教导一概加以怀疑和否定，以蒙上青年的眼睛，把青年拖上反党的绝路上去！

然而，令人可笑的是，那些宣扬“独立思考”的右派小丑们却正是道地的“木脑瓜”。他们所“独立思考”的东西早已是几十年的霉货了！我们的党一出世，就遭受到敌人的谩骂污蔑以至扼杀。他们骂我们党是“共匪”，并且用血腥的屠杀来镇压！

然而所有的敌人都失败了：现在，美国佬滚走了，劊子手蒋介石躲在台湾，剝削阶级消灭了。但是謾罵并未停止。杜勒斯、蒋介石不是天天在叫嚷着要消灭共产党嗎？帝国主义的御用新聞社不更是天天在尽其造謠污蔑之能事嗎？至于修正主义的怪調也早就被考茨基之流吹过了。右派小丑們的造謠污蔑之伎倆并不比杜勒斯、蒋介石之流高明。他們的濫調何尝有一絲儿“独立”和“思考”的气味？

但是，我們有些同学却受毒不淺。他們十分热中于右派分子的所謂“独立思考”。在一次小組討論会上，一个同学曾帶着嘲笑的口吻說：“哼！他們（指干部）說話就是教条主义。人民日报社論怎么說，他就怎么說；首長怎么講，他就怎么講。真是留声机，傳声筒，一点也不独立思考！”言下之意，倒好象人民日报社論所說的話就不該說，首長講的話就不該講，否則就是“教条主义”。我不想以最坏的推測来評論这个同学，但是他这种思想却是十分危險的。

人民日报社論說的对，为什么不能說呢？首長的話講的正確，为什么不能講呢？难道人民日报說“要和平”我們必須說“要战争”，首長講要“热爱祖国”我們必須說要“背叛祖国”才是“独立思考”嗎？按照那位同学的邏輯那么“1 + 1”就不應該說等于“2”而應該說等于“3”才不是“教条主义”囉。看，这是何等荒謬！其实这个同学本身却一点也未“独立思考”，因为他連最根本的是非也弄不清，而是站在反党的立場上观察事物。他罵別人跟着人民日报社論和首長講話是不“独立思考”，但是自己跟着右派分子叫叫嚷嚷又何尝有“独立”可言！

有个同学听不进“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等话，说什么：“都听烂了，谁不会说几句。”而对于右派分子向党的疯狂进攻则大为欣赏，说什么“这是我有生以来听到的第一次最动人的演讲！”他认为前者是“书本上都有的教条主义”，而后者则是“独创的”东西。本来我们和右派分子没有共同的语言，这无须争辩。但是对于一些受害的青年来说，就不得不说个明白。

“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这是六亿人民的“肺腑之言”，“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人民几十年来在血的教训中得出来的一个伟大的结论。我们的父兄在为人民的事业战斗的时候，不仅“独立思考”“深思熟虑”，而且抛头颅、洒热血。多少烈士当敌人的枪口对准了胸膛的时候，还高呼“共产党万岁！”他们视死如归，从容就义，因为他们知道为人民的事业而死是光荣的。我们继承烈士们的事业，我们时刻地歌颂我们的事业，这难道是不“独立思考”吗？

什么是我们的“独立思考”呢？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任何东西都用鼻子嗅一嗅，鉴别其好坏，然后才决定欢迎它，或者抵制它。”对于党的政策和指示，我们也要“独立思考”。那就是我们要开动脑筋，深入学习，彻底领会其精神实质，全面地联系实际，以便更好的执行党的政策。而不是死背硬套，更不是怀疑甚至抵制。总之，党教导我们“独立思考”，是要我们在各项工作和学习中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付出艰苦的劳动，多用脑子，多找窍门。至于那些右派分子的所谓“独立思考”，那是毒物，我们决不要上当。

（原载“中国青年报”）

“墮性”和“独立思考” 克之

報載，交通部專門委員，右派分子俞塘說：“共產黨員有一種‘墮性’的表現，他們不是靠勞動，而是靠黨吃飯，靠黨作官。”另外有的右派分子說：“共產黨員做事不帶大腦，不独立思考，照章辦事而已。”

以上兩種謔言，說法不同，目的則一，都是在反對黨的領導。不必多駁，就一目了然。

值得注意的是，右派分子的這種別有用心的攻擊，在戰術上還有個名目，叫做“攻心戰”。他們打着“独立思考”這塊招牌為掩護，到處宣揚說，“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么！好一塊特殊材料，什麼事都靠黨，沒有個人見解，思想懶漢。”右派分子以為這一箭，既可以一棍子把共產黨員掃倒，又可以動搖共產黨員的党性，使得一些人“起義”。這樣一來，共產黨豈不“垮台”。算盤真是打得如意。

不過，右派先生們，完全想錯了。根據我們對共產黨員的理解，忠實的共產黨員既不會上當，也不會中毒。黨，對他們來說比生命還要寶貴；他們辦事的時候，必須把黨的政策和實際情況聯繫起來，因而不能離開黨；他們的一言一行，必須依靠黨的思想指導，也不能離開黨，這就是党性。右派先生們企圖用“墮性”來代替共產黨員的党性，恐怕比想吃天鵝肉還要難啊！

右派先生們的“独立思考”既有其居心，也有其出處。五毒俱全的章乃器曾經說過，“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做成的這一說法不妥，助長了宗派主義。”搖旗的右派分子就拋出“獨立思

考”，“墮性”來助陣，一板一眼，節奏合拍。儘管右派分子挖空心思，掏出各種各樣的毒計，其目的就是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資本主義的復辟。由此可見，右派先生們販賣的“獨立思考”、“墮性”等私貨，早已打上了“黨天下”的烙印，不難被人們識破。誰有“墮性”，原來是右派分子自己，對於右派分子來說豈不悲哉！

（原載“光明日報”）

偷換概念，顛倒邏輯 朱白

右派迷人的法術之一是運用邏輯學上“偷換概念”的把戲。譬如：我們說要“擴大民主”，右派卻提“爭取民主”。初看起來，所差無幾，實則差了十萬八千里。我們認為我們的社會是民主的社會，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有必要發展和豐富民主的內容。右派說：“不，沒有民主，要自下而上地爭取！”原來二者所說的民主實質不同：我們要擴大的是社會主義民主，而右派所爭取的是資產階級民主。此民主並非那民主，右派就是慣於穿起和我們相同的外衣，以包藏和掩蓋惡毒的賊心。

右派提倡的“獨立思考”，也無非是這種把戲。黨教導青年要“獨立思考”是與反對“思想懶漢”相對而言，是為了強調認識過程中的思想勞動，以確立科學的世界觀和獲得真正的智識。右派的“獨立思考”是什麼呢？請看黨的叛徒、北大右派分子龍英華的回答：“重復眾所周知的道理就是教條主義；獨立思考就是要說別人沒有說過的話。”也就是說：一般人肯定的東西，他要否定。在革命的常識面前，他偏要標新立異提出與眾不同的主張。為了名正言順起見，不如把他們的思考叫作“獨

特思考”，以区别于我們的“独立思考”。

其实右派分子的思想也并不“独特”，因为不是每个右派分子都有自己的一套見解，而是所有的右派分子只有一个見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見解！

右派的“独特思考”，詳加箋証就是“独立于社会主义之外的特殊思考”。他們这一陣“独特思考”的實質是：在我国处于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一批独立于社会主义之外的人，反对社会主义的資产階級思想的大暴露。

右派的“独特思考”其思想方法也是頗为特殊的。因为学习馬列主义学得不好而产生了教条主义，右派就說：为了克服教条主义必須取消馬列主义；我們認為社会主义制度的某些环节有缺陷需要調正，右派則說“不要改良主义，我們要彻底变革，要爆破！”右派总是自称为帮助党整风的医生。可是，他們是这样的一种医生，看見人家头上長了个瘡，說：“为了彻底解决問題起見，把头割了吧！”就其思想方法來說，不但不是辯証的而且不遵守基本的邏輯規律，达到惊人的思維混乱。这也难怪，要把无理的东西編造了去哄騙別人，又怎能不用一些“特殊手法”呢？有些政治上搖搖摆摆的人說：“他們的結論虽然不对，但是思想倒很活跃，提的意見給人有新鮮感觉。”真理只有一条，运用正确的方法得出正确的結論也只能有一个；歪理可以有无数条，运用錯誤的方法得出錯誤的結論也可以有千万个。这千万个錯誤結論都不同于那一个正确結論，也許可以給人有一点“新鮮”感觉，但这正是違反真理的思想在活跃，真理不怕重复，重复千万次，它仍具有真理的力量；錯誤的意見再“新鮮”，它毕竟是錯誤的。

（原載“中国青年报”）

士 的 性 格 凡 兵

有些知識分子，在幫助黨整風的發言中，經常提到“士為知己者用”、“士為知己者死”。有一位大學教授還說：“和黨已經傷了感情，怎麼還能夠一起走社會主義的路呢？”這，不由得使我想到士的性格問題。

士是什麼樣的人？士就是過去所說的“士農工商”的“士”、“讀書人”。在今天，就是指的那些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如大學教授……）。

士，總是有優越感的。在他們看來，因為自己是多讀了幾本書的“讀書人”，“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理應按照“士農工商”的順序排在第一位；因為自己是勞心者——智力勞動者，當然也就理應根據“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原則”使自己成為統治者、領導者，而不是屈居為被統治者、被領導者。

士，總是很講求感情和自尊心的。如果你了解他，尊重他，和他感情好，彼此成為“知己者”，那他就肯為你付出全部力量，甚至“赴湯蹈火，在所不惜”。這就是他們所經常說的：“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得一知己，死無可恨”、“士為知己者用”、“士為知己者死”。如果你不了解他，對他不尊重（或他自己有這種感覺），他就會有“懷才不遇，能不得展”之感；就要下定“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之心，明明看出問題，也“知而不言，言而不盡”，或者感到自己“有職無權”、“人微言輕”，

明明在位，也不謀其政；甚至总是感到和领导人“格格不入”——“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合则留，不合则去”，末了，干脆来个“拂袖而去”。

知识分子的这种优越感好不好呢？知识分子有一定的知识，当然是好的，因为革命和建设都不能离开知识。但如果过分夸大了自己的知识，认为只有知识分子才是“有知”，党和工农群众都是“无知”，因而产生了一种优越感，把尾巴翘到天上去，目空一切，这就不好了，因为这种优越感不是别的，正是阻碍知识分子同党与工农劳动者打成一片的一道墙而已。

知识分子富于感情和自尊心，好不好呢？感情和自尊心，人人有之，也是人人应当有的。问题是在于如何了解这种感情和自尊心，在于有什么样的感情和自尊心。如果只是看你是否了解我、尊重我和对我感情好不好，以此作为自己是否值得付出力量和忘我、牺牲的标准，而不着重看是为谁，（少数人还是大多数人？革命还是反革命？）付出力量和为谁牺牲，那么，这样的感情和自尊心就“不足为训”了。事实上，过去的三大敌人，今天的右派野心分子也正是利用了知识分子的这种感情拉他们下水的。今天，在反右派的斗争中，有些知识分子，由于私人感情关系，不肯大胆揭露右派野心分子的阴谋活动，有的对思想改造、肃反等运动的某些偏差念念不忘，甚至如某教授说：和党已经“伤了感情”，“不能再和党一起走社会主义的路”，那就更要不得了。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又走什么样的道路呢？不管你愿意与否，那还不只能是和章罗反动联盟走在一条道路上吗？

今天在我国，知识分子同广大劳动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一道来建设社会主义。党和组织上的领导人，确应好好了解 and

尊重知识分子，注意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党的个别组织和少数领导人，由于有着宗派主义情绪，在这方面确存在着一些缺点。今天党的整风运动，也正是坚决克服这一方面的缺点。但另一方面，知识分子自己，确也应当好好地改造思想，兴无产阶级的思想，灭资产阶级的思想，变“优越感”为“责任感”，变“私人感情”为“工作热情”。建设社会主义是全国人民集体事业，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而不是为某个领导者服务。因此，还是把眼光放大到广大人民和社会主义建设上去吧。事实上，只要自己好好注意思想改造，并诚心诚意地帮助党来整风，自然也就感到党和领导者是知己了。

(原载“人民日报”)

“士为知己者死” 克 约

“士”就是旧中国人们对于知识分子的一种称呼。他们是旧中国知识的垄断者，基本上是为封建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服务的，他们本身虽然已成为统治集团的一部分，但无独立的人格，因此，也无具体的政治立场。只要谁对他“封侯”、“赐金”，“三顾茅庐”——“礼贤下士”，他就为谁服务，甚至认为他的雇主是“知己”，而“愿为知己者死”。

工人阶级可说是知识分子真正的知己。她知道在资产阶级的垄断时代，文化也是资产阶级的垄断物，这时，工人阶级为了把本阶级所具有的社会主义思想能够系统地提高到理论上来，

需要借助于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才能達到這個目的；而且她也知道：“在階級鬥爭接近決戰的那些時期，統治階級內部，整個舊社會內部瓦解的過程便來得非常強烈，非常尖銳，致使統治階級中有一小部分人脫離出去而歸附於革命階級，即歸附於未來的主人翁階級”（共產黨宣言）的可能性。中國工人階級還知道中國知識分子和他們曾為之服務或受其影響的資產階級一樣，在政治上是有兩面性的；知道他們的知識對於人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是有極大用處的，是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財富；同時也知道他們的有些知識對於新中國是有危害的，需要對他們進行“脫胎換骨”的社會主義改造，才能發揮其有益的一面，消除其有害的一面。中國工人階級可說是充分知道中國知識分子的優點和弱點的。因此，“愛之以德”，“待之以禮”，“用其所長”，制定了適合他們的實際情況的“團結、教育、改造”的政策；改變了舊中國對他們的冷遇、歧視、僱傭的關係。

中國知識分子對待這個真正的“知己”是怎樣的呢？他們中已有一部分人政治上具備了工人階級的立場，積極為社會主義服務；甚至其中已有不少人為社會主義事業犧牲了生命的。但其中也有不少，直到目前，他們的立場仍是搖擺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中間不定。可堪注意的，還有一部分人，在感情上“不忘故主”而且直到今天，“故主”仍在大海的彼岸把“光復大陸”的“希望”寄托在這些“民主個人主義者”身上，於是他們就認為“故主”是他們的“知己”，而“願為知己者用”。這些人應該清醒地看看政治形勢的發展，選擇自己的前途。

（原載“人民日報”）

談“禮賢下士”

潤海

右派先生們說：共產黨不能“禮賢下士”。士，如果是指正直的，跟人民站在一邊的知識分子，黨對他們一向是關心的、尊重的；但是，這裡的所謂“士”無疑是指右派先生自己而言了。最近章乃器甚至說：“為什麼不動員我這份力量呢？”這樣使黨“失去了一個在反右派鬥爭中能起作用的人。”如此看來豈不是黨真沒能做到“禮賢下士”嗎？不然，怎麼會逼得“士”竟“毛遂自薦”起來了呢？

戰國時代的信陵君是以能夠“禮賢下士”而著稱的。而信陵君所禮待的“士”對信陵君的確起了很大作用。如由於侯生的獻計，而使信陵君得到虎符，率晉鄙大軍退秦救趙。由於毛公、薛公坦率地向信陵君提出意見，而使信陵君在國危之時歸魏，率五國之兵而破秦軍等等。看到這些，人們都會感到信陵君的“禮賢下士”的確是種英明之舉。

然而我們再來看今天的所謂“士”吧！共產黨歡迎黨外人士幫助黨整風，按理說這正是“士”為朋友幫忙的時候。而這些“士”如章伯鈞提出設立“政治設計院”；羅隆基要成立“平反委員會”；還有些右派分子聲言要黨撤出學校、撤出機關……這都是些什麼意見呢？是幫助朋友改正缺點嗎？不，這簡直是叫朋友下台。葛佩琦更要“殺共產黨員的頭”。這些“士”不正如鄧初民先生所說的“中山狼”嗎？

對這樣的“士”，如果黨要以禮相待的話，那麼，豈不是“禮賢下狼”了嗎？

算了吧，右派先生們！我們絕不會作出如此蠢事，因為“士”和狼我們還能分清！

（原載“北京日報”）

“舊知識分子” 略 漢

知識分子不願別人冠以“舊”字或“資產階級”等字樣，以為這樣就失掉了尊嚴，不能容忍，並且還要“始終感到遺憾”的。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傅鍾孫就是典型的例子。他憤然問道：

“工人何嘗不是從舊社會來的？農民何嘗不是從舊社會來的？為什麼偏給知識分子加上個‘舊’字？這又何苦？”

這一問，倒很重要。意思是說：同樣都是從舊社會來的，你們為什麼對工人、農民這樣客氣，不稱之為“舊”工人和“舊”農民；而唯獨對知識分子過不去，偏要在他們頭上加個“舊”字？厚此而薄彼，公道么？在教授兼副校長的追問之下，我們不得不恭敬以答曰：事實如此，又有什麼辦法呢？

知識分子當中有些人是“舊”的，這是因為：第一、他們本來是從剝削階級出身，有了知識之後，又為舊的統治者長期服務的緣故。第二、解放之後，有些人雖有一定程度的改造；但是思想感情還沒有完全變過來，“舊”的氣味仍然很濃厚。第三、不承認自己是“舊”的，或者聽到“舊”字就引起反感，這倒正是一種舊的表現。

至於工农呢，他們在舊社會是被壓迫被剝削的階級，又是直接參加勞動生產的階級，從階級關係和革命動力的角度來衡量，這正是一種新的社會力量，因此，解放以後，是沒有什麼新舊之

分的。知識分子則不然，从五四运动以来，以对革命的态度作为分野，有人左傾，有人右傾，显然是站在两个营壘进行斗争的。这次全国轟轟烈烈的反右派斗争，誰能够說那些对党仇恨的人，对社会主义心怀不满的人，全盘否定祖国建設成績的人，不是“旧”的、“资产階級”的知識分子呢？連这一点极其淺显的道理都不懂得的教授們，岂不是正說明自己已經“旧”得发霉了么？

知識分子，果真象傅鐘孙所說的那樣：“看事要看得明白些，看得敏捷些，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大道理不会看不懂”么？事实証明，高級知識分子当中糊塗人是不算少的，他們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大道理就偏偏看不懂！或者說，字句看懂了；但馬列主义的精神實質呢？对不起，真的看不懂。沒有无产階級的思想感情，立場、观点、方法不对头，缺乏革命的實踐，又怎么能真正懂得馬列主义这一門階級斗争的科学呢？这和数学、物理、化学都不同，絕不能把它簡單地作为一种“知識”来接受的。

現在的問題不在于斤斤計較新的还是“旧”的，更要紧的是先放下“唯我独尊”的臭架子，从認識自己开始：如果真是“旧”的，就要服輸。然后以此作起点，認真学习和實踐，不断地改造自己，这样才有希望。明明是“旧”的，而还要妄自尊大，那就不堪設想了。

新旧之間，本来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关键問題在于下最大的决心进行自我改造，真正从思想感情上来一个彻底轉变，脫胎換骨，变成为工农服务的新知識分子。旧乎？新乎？这岂是“呼之即来，揮之即去”的玩意呢？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看来“旧”知

識分子這頂帽子，即使到現在，對於某些人也還是非常合適的。理由很簡單，因為事實如此，誰也不能不尊重事實。“為什麼偏給知識分子加上個‘舊’字？”我想道理也就在此。

（原載“文匯報”）

小論右派之“才” 原 冰

右派人物的臉譜，邇來人們多已識精識徹，蓋真相既漸大白而論之者亦已眾矣！右派諸君尚有另一副共同嘴臉，就是夸稱自己有“才”，而對共產黨員則閉目而警（目閉本不可警，然張目而不見與閉目同，是閉目而眼珠內轉者也）之曰：“你們無‘才’，你們是‘外行’”，於是，喟然而又傲然曰：“你們何不讓位，請吾派‘命世之才’來駕輕就熟乎？”

洋場惡少施鰲存，寫了篇“才與德”，極泄其悲天憫人、懷才不遇之牢騷；以毒草園丁自命的尙丁，也大倡“人才主義”，且為人事工作提出“才五德三資二”的比例原則；楊兆龍則嘴角挂着冷笑：“倘使政府請我去，給我三個月時間，民、刑等等重要法典，皆當一一拿出”，言下慨乎其詞，何當今共產黨竟不識吾楊兆龍之“才”也。

右派諸君自以為有“才”而耿耿于懷者大概有這幾種情況：

平生皆讀古今中外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之書，深受薰陶，或服膺于凱恩斯，或寄魂于拉斯基，或念念于儒家正宗，或拳拳于胡適私澤；懂得一些資本主義的德謨克拉西，學得一些縱橫捭闔之道。皆自以為這乃是大“才”，是自己畢生之資本，滿心滿意將以此“本”而求“宏利”，偏偏而今顧客寥落，社會主義對這

一套并不热誠接待，且要批判之、改造之。于是，虽然身受安排，荷人民之深恩，却不怪自己缺少社会主义之貨，偏要怪当今之世不重視他們那一套自以为才的“才”，因而郁郁于心，忿懣不已！这是一种情况，右派中这样的人有，但不頂多。

虽然讀書不多、用力不勤，却也獵得一支所謂能文之筆。剽襲掇拾，空話加上歪理，塗脂抹粉以成篇；捕風捉影，想象配以夸張，标新立异而惊众。还会得搆进步之招牌，售反动之私貨。这一套本領，在从前确也曾上得反动統治者之青睞，中获小市民之兴趣，下也曾騙得一些正直的对当时反动統治现实不滿的人們，在渴求真理的心情下誤用来疗飢。于是，这些右派先生們自以为此“才”大矣，当沒世而不朽。无奈社会早已前进，国家主人換了被馬克思列宁主义所武裝的工人階級領導下的人民，使右派諸君的西洋鏡越来越被拆穿，心有不甘，怨毒由此而起矣！这又是一样情况，右派人物中这样的人不少。

尽管既不懂得种田又不懂得織布，对社会主义从无所知，对劳动人民甘苦更全然不曉，托祖宗剝削余蔭讀了几天書，儼然也充上个知識分子。一向自吹自擂，善于互捧互抬，狂言震人耳鼓，謊話逼人嘔吐，即被揭穿，亦不臉紅。凭着这一套，当年也曾自得其乐，吓倒过一些人也騙倒过人，搖搖摆摆，居然也曾蛮吃得开。自然以为此“才”也不小，奈何在共产党領導下的新中国居然碰壁，每因此“才”而反受奚落，于是乎恨恨不已！这也是一种情况，这样的“人才”，在右派諸君中大有人在。

此外，还有一种右派人物的“才”便是善于苟且鉅營，拉拉扯扯，見了面一只手朝对方肩头一拍，臉上腮肉上聳，双目微眯。一方面天南海北謬托知己，一方面眼珠子暗轉几下：“好小子，总

得从你身上弄到点什么！”見張三說李四，口蜜腹劍，翻手为云复手为雨，对国民党小屬大帮忙，对共产党明頌暗咒。这一派宏“才”，在我国解放前确曾走过紅运，正陆詒所謂的兜得轉、吃得开，尙丁所謂的“左派看我是左派，右派看我是右派”，左右逢源、顧盼自雄，当日办报搞出版以至写文章，皆賴此“才”，那曉得現在沒有人賞識这种貨色了，于是牙齿咬紧、眉头皺紧，而忿然、而暴跳如雷、而揮戈乱刺矣！

昨日今朝大不同，右派諸公的“才干”越来市場越小，眼看着就要寿終正寢了，怎能不心痛呢？于是，右派諸君不能不为自己的这些才而惋惜、而潸然涕下、而嚎啕大哭！

可是，这究竟是些什么“才”呢？又是依附在什么基础上的“才”呢？这乃是封建主义、資本主义之“才”，流氓、市儈混世虫儿的“才”。这些“才”，是依附在封建主义、資本主义以至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基础上的“才”！如此之“才”，不容于社会主义，道理很明白；因为社会主义的經濟基础根本不同于封建主义、資本主义或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經濟基础。

我看，右派諸君也不必恋恋于你們那些“才”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若將你們的“才”比之为“毛”，你們这种“才”的依附基础比之为“皮”，那末，你們的皮已經死了，你們这些毛究竟附在那里？你們到处夸称你們的“才”，岂非你們还要使死去的皮复活么？

事情明摆在这里！我們共产党员和一切真正的社会主义战士，确实缺少右派諸君之“才”，然而却独具热爱社会主义、忠于共产主义事业之才！右派諸君，你們呢？……

（原載“文汇报”）

斥“惜才論”

張 超

反右派斗争中，某些人的“惜才”观点又有所抬头。

“惜才論”者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說法，今天又有了新的論据。他們說在过去历次运动中，反对惜才观点，都是对的；但在今天反右派斗争中却不得不考虑到真正的人才問題。因为过去几次运动中的对象，真正的人才总是一小部分，而今天的反右派斗争所涉及的多是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教授等等大知識分子，是一些真正的人才。不考虑到这一点，必然使我們蒙受不可弥补的損失。所以，今非昔比。

果真“今非昔比”嗎？然，亦不然。

从現象看，的确，反右派斗争比过去历次运动所涉及的“大知識分子”要多些，但这只是問題的一面；另一面，要探求問題的本質，談“才”就必須弄清“才”是为誰服务的，否則就根本談不上可惜不可惜的問題了。

不論过去的三反、五反、鎮反、肃反或今天的反右派斗争，我們的着眼点只有一个，要反的都是不利于人民，不利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人。这些人所干的勾当是直接違背人民利益的，因此人民就要“反”他；只有这样，才能保卫人民利益不受其損害。对这些人，他有才也好，无才也好，才大也好，才小也好，其本質是一样的，我們不能憐惜其中的任何一个。

人的“才”是受人的支配而发挥作用的。人不是机器，是有思想、有立場的高級动物。在阶级社会里，人的阶级立場决定着人的思想行为。站在反人民立場上的人，縱然他才大无量，于人

民何益？相反，其才愈大，所干的反人民行为愈凶狠，对人民危害愈深。

今天的右派分子中确实不乏“才俊之士”，有的还是專家教授之流的大知識分子，然而他們站在資產階級右派立場上來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在这种反人民的勾当里發揮了他們卓越的“才能”，象这样的人才是應該憐惜呢抑或必須反对呢？这是站在人民立場上的任何人都应弄清的一个界限問題。

当然，假如这些右派分子不是右派，假如他們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好好地为人民服务，那么如果失去他們是可惜的。但这仅是一种假設。我們今天对右派分子开展斗争，倒是希图挽救他們，只要他們能够向真理低头、向人民服罪、脱胎換骨、痛改前非，人民还是可以寬大他們，給以工作机会。这才是真正的惜才。只有那些頑固的右派、坚持反动立場、坚持与人民为敌，那是他們自絕于人民，对于这样的人，毫无憐惜之可言。

“今非昔比”是錯誤的，在階級斗争里任何时候都必须反对离开階級观点的“惜才論”。

（原載“光明日报”）

談“鋼筋”

栗福炳

中南土木建筑学院教授刘旋天，运用鋼筋混凝土的結構作了这么一个比喻：把砂子、水泥、石子比作工农群众和一般知識分子，把鋼筋比作高級知識分子，特别是美国运回来的高級知識分子。言外之意有二点：第一認為砂子、水泥、石子都是土生土長的东西，只有鋼才是千錘百煉的东西。要建設一棟雄偉华丽的大

厦，不但离开了鋼筋不成，而且鋼筋还是骨干，也就是說要建設社会主义社会，离开了高級知識分子不行，高級知識分子是建設社会主义的骨干。第二，鋼筋是独立的東西，只有砂子、水泥、石子通过粘結力去粘結鋼筋，意思是講只有工农群众与共产党應該去團結高級知識分子，而高級知識分子不需要主动靠攏工农群众与共产党。

現在我們来看他这个比喻的實質。

第一、我們承認要建設一株雄偉华丽的大厦，沒有鋼筋是不行的，要建設社会主义社会，也需要一定的高級知識分子，但是問題在那里呢？問題是需要什么样的高級知識分子，如果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象刘旋天之流的所謂高級知識分子，則不是鋼筋而是朽木，不但不是什么缺少不得的東西，假若拿来当真的鋼筋用，还会出乱子。

第二、如果說鋼筋是骨干的話，那也應該是工人階級和它的先鋒隊——共产党，当然我們不否認高級知識分子对建設社会主义有很大作用，但是沒有共产党的領導是不行的，国民党时代也有好多高級知識分子，但那时是无法对建設社会主义作出貢獻的。刘旋天將高級知識分子比作鋼筋，喻为骨干，實質上是想借此把高級知識分子抬高到不适当的地位而降低党的作用以至否認党的領導，其用心亦良苦矣！

第三、工农群众与共产党應該而且必須團結教育高級知識分子，使他們能够更好的同全国人民一道建設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这不等于說，高級知識分子就可以自命清高、傲視一切，不进行自我改造，不接受共产党的領導，不为劳动人民服务。——这样搞下去，高級知識分子必然迷失方向，自絕于人民。刘

旋天之只有砂子、水泥、石子去粘結鋼筋的比喻，是有意煽動高級知識分子不要接受改造，不要接受黨的領導，我們應該揭露他的陰謀。

(原載“新湖南報”)

“脫胎換骨”

克 約

我國的語文是很優美的，特別是有許多成語真可以說得上是豐富而多采。一句成語寥寥幾個字，可是它所代表的意義卻深湛極了，甚至用一連串的現代詞匯來描寫，還不如它一語破的。有的甚至只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詮。如果有人對於我國文學缺乏素養，望文生義，那就難免弄得笑話百出，而貽笑大方了。我想到我的童稚年代，聽到老人說從前皇帝是“金口玉言”，就使我童年幼稚的腦海里浮起幻想，想象皇帝真是有一個天生成的金口和玉舌似的，只有我們老百姓的口和牙才是骨肉做到。聽到說故事時罵某人是鐵石心腸，就幻想這個人的心腸真是堅如鐵石一樣。

想不到類似的笑話，居然出現在今天，而且是出自某一些高級知識分子之口。他們不滿意有人用“脫胎換骨”來形容中國資產階級分子的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思想變化；但是，一般人，包括資產階級分子在內，都認為這一形容詞是說明得再恰當也沒有了，是非常深湛的，是說明了經過了艱巨的過程和陣痛而後起了質的轉換的。因為，把資產階級分子由一個剝削者改造成為名副其實的勞動者，不是輕而易舉的，是要經過資產階級分子深刻的內心的自我鬥爭才能奏效的。如果望文生義，也只能說在思想

方面脫去剝削階級的“胎”，換成勞動者的“骨”；既然已經知道“脫胎換骨”這一成語是道家說明他們“修煉”的“道行”功夫已到“脫凡胎換仙骨”的境地，那末，如果一定要聯想的話，我也同意有人說的，那就應聯想到同道家有關的另一成語“超凡入聖”，而不致聯想到同這毫不相干的“抽筋剝皮”。

我不明了他們為什麼要作如此的聯想。把“脫胎換骨”解釋成為“抽筋剝皮”的用意何在？他們是否早已預料到這是會挑起工商界人士對社會主義改造的反感？至於帝國主義者和反動分子會借此造謠的問題，那也可以請這些先生們放心，是不必害怕這些的；帝國主義者總要想出些新花樣來咒罵我們的。讓他們的造謠和咒罵，追隨着過去曾經流行在海外和國民黨統治區的如“聞香隊”、“裸體遊行”等類似謠言之後，被事實來戳穿而自行煙消雲散吧！

我相信，“脫胎換骨”這一成語，對一般樂於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資產階級分子來說，以他們的亲身体會，是只會從其中深刻地認識到思想改造是一個艱巨的過程，在他們把企業交出以後，思想上固然會有很大的變化，但不能立即無繼承性地產生完全相反的“突變”；以他們現有的文化素養，更是不會引起“抽筋剝皮”這一誤會的；即或存在誤會，經過講清道理，也就冰釋了，泰然了。但是，某些人卻以拒用“脫胎換骨”這一句話作借口，硬說思想改造是輕而易舉的事，甚至認為資產階級分子現在已沒有什麼可以改造的。這些人，要么就是未經改造，不了解改造的艱巨性；要么就是強詞奪理，把這作為擋箭牌。對於這些人，這個解釋或許是多餘的；我還能有什麼可說的呢？

（原載“人民日報”）

談“有职无权”

覺 說

担負了一定的“职”，就要負責尽职，就要有負責尽职的一定行为的“权”。职、責、权，三者是緊密相联不可分的。

給人以职，却不給人以尽职的权，是难以想象的事。我們国家机关和經濟机关的工作人员，不論是共产党人或非共产党人，絕大部分是尽职的。他們勤勤恳恳地做，老老实实地学，依靠他們，在短短的几年間完成了全国社会主义的改造，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設的很大胜利，穩步的向消灭剝削和貧困、建立繁榮幸福社会的大路前进。在他們中間——很尽职的或一般尽职的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中間，在工作討論上、工作檢查上，大都感到事业新鮮、任务繁重、学識不够用、經驗不够用或者時間不够用，以致常不免发生缺点和錯誤，但沒見有人感到权力不够用。虽然也有人埋怨他的工作沒有得到有关方面有力的配合，或者他的意見，沒有得到某些領導者的有力支持，但这些，是工作上相互研究、相互調整、需要費些力量和時間的問題，而不是关于工作人员职务上的权的問題。

有一种人，消极怠工，应做的事不做，应管的事不管，有权不使用；又有一种人，“下車伊始，哇喇哇喇”，不去了解与分析实际，仅凭自己的地位，乱发命令，結果把事情办坏。二者都是失职。不行使权与乱行使权，更不是与有权与否相关的事。

“有职无权”的現象，是不應該有的。但是，在某些非党的工

作人員身上又确实存在着。那是某些機構的黨組織不善于征求非黨工作人員的意見，尤其是負一定責任的非黨人員的意見，加以研究和採納；不善于幫助非黨人員使之了解黨的政策，應該經過他們去實施的沒有經過他們。這樣，使人感到非黨人士是擺樣的，有職無權。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個別的非黨人員，有作客思想，不肯深入地钻研業務，工作來了，提不出辦法或提得很肤淺，有權不能行使。你不行使，必得有人代為行使。因而表面看來，象是無權。

必須糾正這種現象，黨要幫助非黨人士使他在工作的實踐中提高自己、提高其負責盡職的積極性；對於不尊重非黨人士的地位及其正當意見的人須給以教育和批評。同樣，非黨的工作人員也必須以國家主人翁自居，盡責盡職，有阻礙其盡責盡職的，就和他鬥爭。職的所在，即權的所在，無權的現象也就會沒有了。

應該指出某些右派骨幹分子所叫囂的“有職無權”，他們是不把“權”看做是办好“職”的方法，而把“權”看做是個人作威作福的工具。比如他們要求有不受限制的用人權與用錢權等，這是我們不能容許的。一個機構的負責人有权選擇你的助手，如部長局長要推薦某人當司長科長或其他的人等，但必須經過人事機構的審查，經過一定的任命手續。同樣負責人有权審查監督本機構的行政經費和事業經費的收支，但必須符合財政制度，經過一定的審核程序。憑首長一個條子，就可以把某人用進或把某人辭退；憑一個條子就可以提取多少款子或報銷某項用項，這是國民黨的作風，我們早已把它根絕了。我們國家里沒有“用人唯私”、甲來帶一套人馬、乙來又換一套人馬的現象；沒有濫用公款

的現象。這難道是不好的嗎？

在這上面——用人和用錢上面黨對黨員的要求是嚴格的。不管你擔負什麼職務，違反制度任用了私人要挨批評甚至處分，違反制度亂用了錢要賠償以至處分。如果也叫做權的話，那共產黨人不比非黨人員多而是比非黨人員少。

要注意消滅某些有職無權的不正常的現象，要更注意的是某些右派分子自己不盡職却假借有職無權的話向黨進行攻擊，企圖破壞國家嚴肅的行政制度，恢復國民黨的作風，必須給以有力的不可調和的斥責。

（原載“人民日報”）

“有職無權”種種 公 播

右派先生們，頭些日子頗為“有職無權”一事大鳴了一番，民盟中央還特地成立了專門小組，準備以此為題，大作其文章。

“有職無權”的問題在某些單位里存在不存在？存在；為那些有職而無權的人爭回應有的“權”應該不應該？應該。然而右派先生們“做文章”的用意果真在於此嗎？

答話之前，先容我略提作為部長的章伯鈞先生的几樁小事。

報載：章伯鈞先生前些年，頗有些悶悶不樂，自稱交通部長一職只是替人守牌位，干的沒勁，常寄情於古書字畫。

為什麼是守牌位？為什麼會沒勁呢？據說是因為：部之上還有“委”和“辦”、黨組之外還有黨中央的部，以致於積極性礙難發揮。

既然章先生對“權”是如此珍視，想必對現有的“職權”不會

輕易放棄，但也不盡然：今年上半年二十次部務會議，有十七次沒有出席。

作為一員“大材”而被用在“小處”，想必勝任愉快，綽綽有餘。但說也奇怪：掌權交通部八年之久的他，竟不知道“噸公里”是怎么回事。

所有這些，在章伯鈞先生那里實實在在都是些細微末節、區區小事。不過，事雖細、雖微，對我們解答前面那個問題也還不無啟示。

按理說：“有權”還是“無權”必須和職連起來看。一定的職務當具一定的權力，不具有這種份內之權的，就叫做“有職無權”。這本是无庸贅述的。然而章伯鈞却為這一成語作了另一種注釋，這就不得不加以分辨。章伯鈞大呼自己是有職無權，但如前所述，他缺少的到底是什麼樣的權呢？是這樣一種權，即：有我在這里，就不能容你們——國務院的“委”、“辦”，共產黨的“組”、“部”——插手，不能容你們存在，否則，就是我“無權”，按照此種注釋，難怪他們硬說：如今非黨人士全都是無職無權，也難怪他們要把這個當作一個大題目來做文章，因為要去掉妨礙他們“有權”的障礙物的確頗需要動些腦子，費些周折呢！

按理說：“權”乃為執行一定的職務所提供的一種條件，沒有適當的權，職務就難以實現，因此，為了盡職，就得索取本職份內的“權”，這是完全光明正大，理所當然的事，誰也不能妄加非議。然而，章伯鈞先生是否也在此例呢？如前所述，章伯鈞不能說無職，但幾年來却一直棄而不守，部務會不參加，起碼的業務知識也不去了解，可是說到“權”，則是韓信用兵——多多益善，份內的權他要，不是份內的權也要，就這樣還成天价在那裡喊“有

职无权”。他的信条真可謂：权要大大的，事要少少的。这样，也就难怪在他那里“职”和“权”的矛盾老是解决不了，因为在咱們这社会哪里找得到这么“好”的“好事”：只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不承担任何义务呢！除非倒退它几百年，去做皇帝，而且还得做个暴虐的“昏君”还差不离。

話說到这里，答案不是已經很清楚了嗎？章伯鈞及其同流——如象掌管了“木头”还一心想掌“外交”、掌“高教”的罗隆基；当了副校長还想夺取校長职位的錢偉長等等，其所以大喊“有职无权”目的就在于推翻党、取消党，从而夺取国家的最高的领导权。我們和右派分子之間有根本分歧，这話实在一点不假，就連“有职无权”一語含义和用法上都表現得如此鮮明，如此尖銳呢！

（原載“北京日报”）

“緘口”之論

余持平

在对右派分子的声讨、追击声中。隱隱約約听到一种說法。

說是：“凡事都因多开口，若非鳴放之中多說了些話，何致今日成为众矢之的。况多言必失，古有明訓，今后当效古之金人，三緘其口，庶儿免此灾难。”言下不胜感慨。

据聞，这些話始出于右派分子之口，而博得一些“又好心，又糊涂”的先生們的同情。

但，这些話又大抵是在“背地里”說的，或者是同“二三知心好友”的切切私語，原“不足为外人道也”。然而不管怎样，話还是說了的，可見并未真正的“緘口”。

而，这些話却又流傳了出来，“流傳”在实际效果上看来，还起了“宣傳”的作用。

宣傳了一些什么呢？

曰“共产党是不許別人开口的，你瞧，我不过是多說了几句話，言多必失，难免有錯，这下子就受了这么大的打击……”

曰“共产党是相信不得的，諸位当以我为前車之鉴，今后应与共产党离得远些。少說些話……”

諸如此类。

这种宣傳，其阴險毒辣的程度不减于当初他們在台面上所发的謬論。而在今天，他們是裝出一副可憐相，来哀哀泣訴的。他們所說的这些話，听上去又是頗合乎社会上不好的傳統的世故，

因而很能迷糊一些人，难怪乎那些“又好心又糊涂”的先生們聞之动容了。

可是，這些話只能在“背地里”說說，却上不得“台面”，因為一上台面，人們就要他把話說明白，是非說清楚，這一來就含混不得了。

問題原不在話說多說少，或偶有錯誤，而是在要不要社會主義，要不要共產黨領導，在這個大是大非之前，原是不容許含混的。

況且，不單聽其言，也還觀其行。至於“到處縱火鬧事，惟恐天下不亂。極力招兵買馬，意圖取而代之……”這種行為，難道只是“多說了些話”嗎？

今天，他們是在眾怒難犯的情況下，才收起凶焰的，但，儘管如此，“背地里”的這些話却仍然別有用心。

用心何在？曰“挑撥離間，混淆是非”。

右派分子是最不喜歡談清是非的，如有不信，有施鰲存的“偈語”為証。

“此亦一是非 彼亦一是非

唯無是非觀 庶幾免是非”

（一九三三年十月申報“自由談”）

這首“偈語”的“道出”，距今已二十四年了，但在这廿四年，施鰲存的“無是非觀”并未得售。相反的，人們却在这漫長的歲月中，經歷几許艱苦的斗争，接受多少慘痛的教訓，對“誰是誰非”“誰是友人誰是敵人”却是看得一清二楚了，這也就是為什麼右派言行，一經揭露出來，就引起全國人民的痛恨，而予以迎頭痛擊的原因。

只要能分清是非，嘴臉也就不難看出。故“緘口”之論，即使能欺騙那些“又好心又糊塗”的先生們于一時，但終究還是要拆穿的。

(原載“解放日報”)

“庶人不議”與“庶人議” 陳旭麓

孔夫子在“論語”上說過這樣一句話，“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如果國家的政治清明，老百姓就不發牢騷、不提意見。這一直是被奉為顛撲不破的真理的，它既使人不許“議”，也使人不敢“議”。想不到二千幾百年後的康有為，却不同意這句話，但他又不敢公然違背孔夫子的“教條”。怎麼辦呢？他想了一個妙法，說什麼“今本”有“不”字，“舊本”沒有，因斷定“不”字是衍文，應據“舊本”改正，成為“天下有道則庶人議”。雖然只有一字之差，“庶人不議”與“庶人議”，卻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境界。這裡當然不是一個“今本”和“舊本”的問題，康有為既沒有說出那個“舊本”來，事實上也沒有這樣的“舊本”。因為康有為要搞維新運動，主張以立憲來限制君主專制，要求廣開言路，發動一些人來大談政治，同時他又又要維護清廷的統治，“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的話，卻與這一要求相抵觸。如果我們不責怪他那種“六經皆我注腳”的治學態度，倒不失為王船山所說的“六經責我開生面”的創見。

不過，不管孔夫子也好，“康聖人”也好，他們都只看到事物的一面，沒有看到事物的另一面。

第一，本來事物的发展，就不可能完全無缺，即使是“白璧

微瑕”，既是“瑕”，也就不能讓人“不議”，何況有時還不是“微瑕”。世界上的事物原是變動不居的，用之于此時此地很好，用之于彼時彼地可能就有些不同，或者不甚適合，這是常有的現象，也就常產生矛盾，特別是在大轉變和推新的環節中。有矛盾而“不議”，那是思想和言論的窒息。一直為史籍所稱頌的“唐虞盛世”，也還有許由那樣的人，聞堯要讓位給他，竟洗耳而逃以示抗議的故事。推想更理想的將來，共產主義的將來，恐怕仍不免于沒有矛盾，只要有矛盾存在，“議”就不可避免，而且“議”將成為揭露和克服矛盾的力量。因此“庶人不議”的話，在任何時代都未必合乎事實。

第二、儘管時代不同，讓人民講話，“宣之使言”，單就這一意義來說，“天下有道則庶人議”是對的。然而封建王朝的下詔求言，只是地主階級的互通聲氣，有時議論紛紛，也只是衰世的爭吵，“庶人”幾乎是沒有“議”的機會，他們的“議”往往是以揭竿而起來代替。至于資本主義國家的議會，那些號稱人民代表的議員，不常也在發言盈庭、叫囂不息嗎？然而只是集團間的權利爭奪，不是西風壓倒東風，便是東風壓倒西風。他們雖然“有道”，那是資產階級的“道”，道其所道，非我們之所謂“道”。忘記了這一條，“道”就成為沒有實際內容的抽象名詞。因此“庶人議”也不是“有道”與否的依據。

我想，問題不在於“議”或者“不議”，而要看所議是什麼，怎樣議。即以康有為為例，他所議的是變法維新，要求中國富強。他的七次上清帝書，有些地方也夠尖銳的了，如說“恐自爾之後，皇上與諸臣，雖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與諸臣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向皇帝說這樣的話，是駭人聽

聞的。據說光緒皇帝并不責怪他，反大为感動，而要召見他。因為康有為確實是忠心耿耿的。當然這種對封建皇帝的忠心耿耿，是我們所不取的。我們所要求的，是要對人民忠心耿耿，對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共產黨忠心耿耿。如果基於這樣的態度，所議是為了解決問題，使事情办好，推動社會前進，則那些尖銳的議論，不惟是“有道”的聲音，也是調整社會關係不可缺少的有力因素。否則假“直言極諫”之名，以行其陰險攻擊之實，那麼他不但不是人民的諍友，恰恰是人民的敵人。

同時“不議”不一定沒有意見，好“議”不一定其心不可問，我們要看所議是什麼，怎樣議。離開事物本質的考察，就會被假象所蔽，給工作帶來損害。

在人民的中國，在建設社會主義路程上的中國，議者和被議者本來有着更大的同一性，大家努力的方向正日趨於一致，那些“牆”或“溝”的距離，大多數是思想和言行間的參差。狄德羅說：“真理的利益，將要求那些思考的人終於肯和那些行動的人結合起來”。“議”是我們結合的途徑，並將在實踐中得到提高和發展。

如果是用“議”來掩飾其狂吠，我們就得鳴鼓而攻之。因為只有去偽存真，才能更好的“議”，那也才是我們所要求的“齊放”與“爭鳴”。

（原載“解放日報”）

論“雅量”哲學 熙文

對整風的和風細雨方針覺得不過“癢”，不解“恨”的人，正在鼓起一陣狂風暴雨，並夾帶來一種噪音的合唱。

有的在高声吼叫要跟无产阶级换“交椅”。

有的咬定现在已经没有阶级区别，反对继续改造资产阶级分子，为资产阶级的复辟创造理论根据。

有的杀气腾腾，公开叫嚣打倒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要把反革命分子拉回到六亿人民中来，而独独把共产党人排挤出去。

从调门上听来，这些声音有高有低，但就其调性来说，却又是一个谐和的合唱，歌词的含义要把历史车轮倒拉回去，使中国人民离开社会主义道路。

可是，在这些日子里，我们却听到了一些善心的先生们的劝告，他们要我们有“雅量”来静听这种合唱，要我们对这一切“一笑置之”。这是不能不引人注意的。

我国唐代有个人叫襄师德，别人对他脸上啐了一口，他连擦都不擦，听任口水自己干掉，因而曾受到历代士大夫的赞美，誉之为有“雅量”。据说，上帝也嘱咐过人，要是别人打了你的右脸，你便把左脸也送过去给他打，这大概也是“雅量”。如果事情的确属于无关宏旨的私人恩怨，那末善心的先生们是完全有自由信奉这种“雅量”哲学的。但如果事情是属于广大人民生死存亡的问题，那末我们在这种“雅量”哲学面前就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

有这种“雅量”哲学的人，其中有很多人也许是善心的，可是历史的经验证明，光是善心不能保证不上当。这些先生们几十年中上过不少当。他们上过资本主义的当，上过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当，上过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的当，重重往事，难道已经健忘？难道还不能从中学乖？难道还不能辨别耳音，擦亮眼睛？

自然也还有一些先生们是认真推销这种哲学的，他们企图

以所謂“雅量”來堵塞人民之口，使人民不能發出戰鬥的聲音，迷糊人民的眼睛，削弱人民的鬥志。這些先生們之所以向人民提出“雅量”，要人民“一笑置之”，其目的是為那種噪音的合唱打伴奏，作幫腔。其意無非是要人民有“雅量”退回到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的血腥統治，要人民對資本主義的復辟思想“一笑置之”。

對於前一種善心的先生，只要說清道理，請回顧回顧歷史教訓，他們是可以和我們取得一致意見的。對於後一種認真推銷“雅量”哲學的人，我們却不能不說：先生們，請收拾起你們的“雅量”哲學吧。我們都知道，現在不是張三跟李四在作無聊的爭吵，而是一場嚴肅的階級鬥爭。在這樣的場合，是沒有和事佬的地位的，有的只是“是”和“非”。在這樣的場合推銷“雅量”哲學，就是叫人民懦怯，要人民退讓。人民不上你們的當。

（原載“解放日報”）

談“一棍子打死”

羅然

“斗右派分子火力太猛了，要犯‘一棍子打死’的錯誤！”——有人這樣說。

話得分清楚。如果說被打死的是人，那我們是“治病救人”，報上的社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發言、機關、學校、工人、農民的批判，都是要右派分子和犯有右傾錯誤的人“幡然悔悟、接受改造”，把他們從死的邊緣救活過來。這裡，並不發生一棍子和多棍子的問題。

如果說，被打死者是右派的言論和行動，即反黨反社會主

义、企图在解放了的人民中国扼杀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那末,“一棍子打死”有何不好?为甚么要“棍下留情”?很显然,这里没有应不应该一棍子打死的问题,只有能不能一棍子打死的问题。

我们善于和持枪的敌人作战,也要善于和不持枪的敌人或仅有反动思想的人作战。这次反右派分子的斗争,有些斗士的棍子,能够把右派分子从历史的远处、从思想的深处、从言论行动组织等各个具体事实的环节里拖出来,使他们原形毕露,无可躲闪;罪恶昭彰,人人喊打;除低头伏罪、接受改造外,没有其他的路可走。虽然这些分子是否已一棍子被“打活”,要看他们已否真的觉悟。但棍子是使得好的,够得上称“上打雪花盖顶,下打枯树盘根”。

但也有些机关、学校对右派分子斗得不起劲,他们不善于发现和析右派分子的丑恶,不善于抓住充分的事实,选择有力的论点去打。因而有的打得不中,有的打得不狠,右派分子不仅不低头,而且有的欺我们无能,反咬一口;有的暂时敛迹,等待时机再起。

我们不仅要投入战斗,而且练习战术,必须彻底打败敌人,且要在战斗中锻炼自己。

水浒传载:林冲和洪教头在柴进的庄子里比棍子,洪教头横着棍,使个门户,唤做“把火烧天势”;林冲也横着棍,使个门户,唤做“撥草寻蛇势”。右派的骨干分子学了洪教头的棍,乘着党整风的时候,分兵遣将,到处点火,呐喊助威,在某些地方也出了一股黑烟,但妄想以一把火,来烧人民所忠诚拥护的共产党领导的天,来烧社会主义建设的天,多见其不自量也。自然只能象

洪教头一样：扑地倒了。至于人民打右派分子的棍子，是用林冲的“撥草寻蛇”势的，蛇是阴暗的东西，它以草为掩护，不能打草去惊，只能撥草去寻，即剝夺去它的外衣，暴露出它的原形、本質。蛇发现了，即右派分子或有右派思想的分子发现了，要分析它体的大小、毒的輕重、及其傳播的影响，然后定出打的内容，打的技术和打的步驟。总而言之，要打得准，使其躲閃的伎倆无所施；要打得狠，不要讓它“死灰”还可“复燃”。

至于我們工作上的缺点和錯誤，不論是自己檢查出来的，是党外人士檢查出来的，甚至是右派分子叫嚷出来的，只要是應該改的，也應該“一棍子打死”。整风就是为这个。难道我們对于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三大主义，还有所爱惜嗎？

一棍子打死了病，即一棍子救活了人。平常說的“当头一棒”就是指此。

（原載“人民日报”）

雜 劍 集

——反右派斗争杂文选

湖南人民出版社